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 與政黑板為例*

陳怡璇、劉桂君**

投稿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2 月 7 日。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疫情知多少？COVID-19 新聞與假訊息的框架與網絡分析》(MOST 1110-2511-H-194-005-MY2) 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中正大學傳播系劉榮樺在資料搜集上的協助，以及期刊匿名評審對於本文的寶貴建議。

** 陳怡璇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研究興趣為社群媒體、媒體使用行為，近來關注網路訊息如何影響民意。e-mail: vickiechen@alum.ccu.edu.tw。

劉桂君為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傳播博士，現為國立新加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標籤行動、文字探勘與社會網絡。e-mail: kueichun@buffalo.edu。

本文引述格式：

陳怡璇、劉桂君 (2023)。〈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新聞學研究》，156: 47-104。https://doi.org/10.30386/MCR.202307.0013

《摘要》

本研究關注臺灣疫情初期的 COVID-19 網路論述，以了解民眾的風險感知以及對風險的解讀。本文觀察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針對 COVID-19 討論什麼？如何討論？以了解臺灣 COVID-19 的公眾論述框架與網友關注的主題，以及各主題間的關聯。本研究借用概念隱喻理論與修辭生態學的觀點，擷取臺灣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實業坊）的八卦板和政黑板中，與 COVID-19 相關的主文與回文。研究方法使用主題模型與主題網絡分析（Analysis of Topic Model Network）近 208 萬筆資料。研究發現：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在 COVID-19 的討論，以中國為圓心，地理位置為軸線，依照地緣政治的層次，呈現臺灣防疫政治、兩岸關係、國際疫情三大論述框架。臺灣防疫政治框架關注臺灣內部的防疫政策與結果，較偏向泛政治的討論；兩岸關係上，呈現親中與反中的對立矛盾；國際疫情上，著重中國在國際政治角力的影響力。整體而言，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論述較少著墨於新興傳染疾病的認識或衛教訊息之討論。取而代之，疫情有如指責中國的借題發揮，實則製造危機感，樹立中國對臺敵意，建立臺灣的認同感。

關鍵詞：公眾論述框架、主題網絡分析、主題模型分析、新冠肺炎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2020 年春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 COVID-19（SARS-CoV-2, COVID-19）升級為全球性流行病，未知的新型冠狀病毒接管全世界。截至目前，全球感染人數突破 5.72 億人，死亡人數超過 639 萬人（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COVID-19 造成百年未見的疫情、影響擴及全球，相關報導從未停歇，大眾對疫情發展的討論也持續蔓延。透過社群平臺，線上疫情相關討論熱絡（Wong, Ho, Olusanya, Antonini, & Lyness, 2021），如邊境檢疫、居家隔離與防疫政策。疫情帶來生存危機與不確定感，感到焦慮與憂鬱創傷的民眾增加（唐子俊、黃詩殷、蘇薇如、鍾維庭，2022；趙恩、陳國緯、李思賢，2021），促使大眾積極透過社群媒體，發表意見或是瀏覽訊息藉以降低對疫情的不確定性。

研究指出，在公共衛生危機情境中，除了政府部門利用社群媒體如 Twitter，宣導防疫知識與建立大眾對公共衛生單位的信任（Dalrymple, Young, & Tully, 2016），民眾也利用社群媒體，發表個人意見、轉貼新聞，參與訊息的再製、篩選與分享（Brown, Yoo, & Johnson, 2019），使用特定標籤（hashtag），如#LetsTalk、#TogetherWeCan，透過社群媒體建立互助網絡，試圖為民眾面對疫情的壓力找到出口（Twitter Public Policy, 2020），顯示公共健康危機發生時，社群媒體是民眾尋求資訊與表達意見的平臺。

風險爆發時，網路民意如何反應值得關注。政府從事風險溝通時，必須即時回應民眾需求、資訊透明、政策清楚明確以降低風險的不確定性。再者，當網友討論成為民眾對疫情風險的重要消息來源時，網友怎

麼說將影響其他人的觀點。因此，網友怎麼談論疫情為重要的輿論觀測點。網路論述與民意成為循環系統，民眾表達民意的同時，也正在形塑民意。網路論述的語言與文字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或價值系統，在建立民眾認知的同時，亦影響民眾的風險感知。隱喻可以快速讓民眾理解複雜的公衛、疾病議題，大量存在於日常語境中。但是，隱喻往往帶有價值判斷，傳達出意識形態或政治認同。概念隱喻理論強調隱喻是建構風險的工具，透露言說者背後的思維與價值觀（Lakoff & Johnson, 1980），選擇性創造出迥異的虛擬真實（Kövecses, 2018）。在風險隱喻上，不同的框架與隱喻讓民眾對風險有不同的重視程度，進而採取不同行動（Read, Cesa, Jones, & Collins, 1990）。例如使用敵對（antagonist-framed floods）框架描述水災會讓人認為災難是嚴重的，進而採取措施；將水災隱喻為病毒，會讓人覺得自己可能會遇到洪水而想趕快撤離（Hauser & Fleming, 2021）。

風險的框架與隱喻影響民眾的風險感知，風險溝通的效果不彰，往往與使用的詞彙誤導或混淆民眾的關注焦點有關，有效的風險溝通需更著重文字的表達方式（Hauser & Fleming, 2021）。網友討論風險的隱喻與框架透露民眾對風險的感知與思維，了解民眾如何解讀與感知疫情，有助於政府檢視疫情的風險溝通成效。

聚焦於臺灣社會，隨著第一例確診病患的出現、口罩短缺，疫情與防疫成為網路討論的熱門話題。批踢踢是臺灣使用者最多的網路論壇，常成為政府與新聞媒體了解民意的來源，也是民眾了解疫情風險的重要平臺。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的論述受新聞媒體、民眾與政府關注。因此本研究探討網路社群在 COVID-19 疫情初期，對其風險感知為何，並借用概念隱喻理論，以八卦板與政黑板為研究對象，探討兩板網友所使用的文字與隱喻建構的風險感知，進而了解網路社群對疫情風險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的解讀與詮釋。

貳、文獻探討

公眾論述涉及語言的使用與轉化，以及文字背後的價值觀，且影響民意的展現。本研究從以下面向探究臺灣民眾在社群媒體上對 COVID-19 的討論為何、如何討論：（1）社群網路論述在公共健康危機的角色（2）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3）修辭生態學（rhetorical ecologies）。

一、社群網路論述在公共健康危機的角色

當危機或自然災害忽然爆發時，社群媒體成為民眾發表情緒、意見的地方。例如地震發生時，一系列的地震文迅速洗版的現象（網路溫度計，2021）。民眾藉由社群媒體表達對事件的反應，不僅呈現多樣化的風險感知與揭示對特定資訊的需求。學者即主張：民眾在社群媒體上留下的訊息，成為公共衛生專家監測疾病發展，甚至是制定溝通策略的重要依據（Signorini, Serg, & Polgreen, 2011）。更重要的是，了解民眾的風險感知，有助於衛生專家針對民眾的需求，作出回應與制定介入策略（Odlum & Yoon, 2018）。例如早期學者透過分析 Yahoo 和 Google 的搜尋字串，發現民眾使用的關鍵字，與流行性感冒高度相關，重要的是，這些搜尋早於官方對疾病活動的監測報告，因此提供相關的流感訊息（Ginsberg et al., 2009; Polgreen, Chen, Pennock, & Nelson, 2008）。

隨著社群媒體的普遍，民眾能更直接使用社群媒體發表與分享對公共健康事件的看法（Odlum & Yoon, 2015）。Signorini et al. (2011) 針

對 H1N1 爆發時，美國民眾透過 Twitter，針對疫苗是否造成孕期副作用、甚至畸形兒的討論，呈現出懷孕婦女及家庭對疫苗的不確定性。對此論述的了解，有助於政府制定施打疫苗的溝通策略（同上引）。而這一研究也發現，大眾對於 H1N1 的討論與風險感知，從 2009 年到 2010 年間，呈現動態變化。在 H1N1 爆發之初，民眾大多發表對洗手、口罩、食用豬肉，以及藥物治療的看法。隨著衛生當局表示感染 H1N1 的患者大多為輕症，此類議題的討論也隨著下降。有趣的是，Tweets 數量僅在 H1N1 疫情爆發之初受到大眾的關注與討論，隨著確診數上升，討論數量卻大幅遞減（同上引），顯示媒體上的網友討論能反映民眾面對疫情的態度與資訊需求，有助政府評估民眾在心態、資訊等各方該如何準備，以面對即將而起的疫情，並擬定接下來的風險溝通策略與防疫推廣。

Odlum & Yoon (2018) 分析 2014 年至 2016 年與 Ebola 相關的 Tweets，發現美國政府不了解民眾在疫情初期的需求，未及時提供民眾所需資訊，導致錯誤的防疫行為與不必要的恐慌。研究顯示，疫情爆發初期（2014 年 8 月 4 日至 8 日），隨著世界各地傳出確診病例，以及第一位醫護人員由西非回到美國，Twitter 使用者表達對 Ebola 病毒傳播的恐慌，以及針對有關症狀、傳播途徑與感染的討論，顯示民眾普遍對 Ebola 疾病缺乏足夠認知，凸顯衛教資訊的需求。Ebola 爆發半年後，大眾關注的焦點從疾病的科普知識，轉化為針對美國政府因應 Ebola 相關政策，例如旅遊管制的討論。因為沒有即時、正確、可信的訊息，非科學性的預防與治療訊息搜尋，成為大家關注的次要主題，例如上帝的治療水晶（God's magic healing crystal），凸顯當時正確衛教資訊的不足，甚至到了 Ebola 疫情後期，Twitter 上的一則貼文「西方有錢人不會因伊波拉致命」（Ebola is not a disease that kills the rich in the West）」被高度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轉推。再次顯示，美國政府在伊波拉疫情的初期沒有提供足夠的傳染疾病的防治之資訊與有效的健康教育策略，到了後期，民眾已形成錯誤認知，導致錯誤的防疫行動。

不同研究顯示，傳染病爆發時期，政府宣傳的公衛資訊與民眾所需存在極大的落差（Dalrymple et al., 2016; Young, Tully, & Dalrymple, 2018）。Dalrymple et al. (2016) 發現：官方的主要訊息重點為強化政府可信度（signaling trustworthiness）與淡化疫情風險（isolation risk）。在「強化政府可信度」類的推文，政府強調疾病防疫專家與防疫守則，藉以呈現組織的防疫能力，進而釋放流行病已獲得控制的訊息；在「淡化疫情風險」上，政府指出感染源——西非與美國在地理位置上距離遙遠，說明在美國境內感染 Ebola 的低風險。這兩類訊息建立政府的信任感，並淡化疾病帶來的風險，可能導致民眾對疫情的輕忽以及對政府政策上的監督。對應 Odlum & Yoon (2018) 的研究發現，民眾關心的與政府強調的重點有所落差。導致民眾對疾病的認知與防疫仍然不足。因此透過了解網路論述，政府可提供民眾所需的資訊，作為有效的疫情控制與介入。

此外，媒體上的疾病討論研究，僅呈現對流行疾病單一的認識與態度。不過實際上，民眾的風險感知受到不同因素而產生多樣態度。Lachlan, Spence, & Lin (2014) 即探討性別、年齡與種族差異與其針對大自然災害——颶風之推文的差異。研究發現女性較男性常透過 Twitter，表達對颶風的擔心與憂慮，尤其是颶風強度與個人健康面向的表達（同上引，2014）。相較於老年人，年輕群族的貼文以發洩憤怒情緒為主，呈現因颶風而導致的財產損失之負面情緒。少數族群，如亞裔與西班牙裔，較傾向在網路上表達對於颶風的看法。由此可見，媒體不僅作為政府防疫的重要窗口，更重要的是，媒體賦予大眾，闡述其對風

險與治理的態度。Lachlan et al. (2014) 尤其指出，在風險中較易受影響的族群，在媒體分享的個人意見，呈現差異且多元的面對風險的需求。政府機構可將網路討論作為參考，考慮民眾對疫情風險的多種反應。

為了進一步了解網路論述的型塑與影響，近年來學者將媒體用戶進區分為兩類：內容創造者 (content creators) 與接收者 (recipients)。例如，Yoo, Choi, & Park (2016) 研究韓國民眾在 MERS 爆發期間的媒體使用情況。研究發現，在媒體上發表與 MERS 相關意見的內容創造者，與自我效能呈現正相關。他們具有較高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夠免於感染 MERS。自我信念使他們較不會將 MERS 視為威脅，因此減弱他們採取預防措施的意圖。相反的，將 MERS 視為威脅的訊息接收者，較積極採取預防措施。兩者在預防性措施形成上的差異，Yoo et al. (2016) 認為，在產生、組織個人意見的過程，內容創造者參與一種目標導向的活動。這一過程，不僅涉入認知與訊息處理，其創作訊息的成果可以帶來滿足感，進而促使內容創造者持續參與有目的性的訊息搜尋，最後正向影響自我效能，以及與 MERS 作為威脅的認知呈現負相關。然而，訊息接收者較少涉入訊息處理的認知活動。因此當媒體鋪天蓋地報導 MERS 死亡人數時，人們傾向對媒體上的此種特定訊息具有印象。

許多研究發現在新興傳染病期間，包括 Zika、Ebola 和 COVID-19，民眾使用媒體尋找資料 (Saud, Mashud, & Ida, 2020)，分享所見所聞 (Wong et al., 2021)，與他人維持連結 (Vogels, Perrin, Rainie, & Anderson, 2020) 的情形不減反增。目前相關研究大多聚焦在 Twitter 上的網路論述 (Petersen & Gerken, 2021)，對於緊鄰傳染病發源地之地區的研究不多。臺灣在 COVID-19 初期，疫情相較國際平緩，但緊鄰 COVID-19 爆發地點，臺灣民眾對於此傳染病的討論。框架有助於理解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民眾的風險感知。

疾病風險議題的論述框架

框架是主觀的「選擇」，媒體選擇自覺「重要」、「值得關注」的資訊，並決定報導角度，捨棄其他資訊。如此，言說者藉由框架定義問題、呈現問題與其因果關係、評估問題的嚴重性、提出解決方式（Dan & Raupp, 2018; Entman, 1993, p. 52）。透過「選擇」、「強調某部分訊息」與「排除其他訊息」的過程，幫助讀者簡化、分類、重組複雜的資訊，用簡單的方式理解複雜的議題，而左右民眾對議題的認知、詮釋與態度（Gamson & Modigliani, 1987; Scheufele, 1999, 2000）。使用不同框架理解相同的議題，會讓民眾對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解讀與態度。健康風險的論述框架「選擇性」的呈現風險，可以把健康風險呈現為安全或危險，藉此影響人們對健康危機的感知與態度，亦影響政策推行。框架關乎於民眾是否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也關乎民眾對官方的信賴（Dan & Raupp, 2018）。

各國討論不同傳染病時，使用的框架各有不同。例如巴西報紙在 Zika 爆發時，使用戰爭框架（War Frame），將 Zika 病毒描繪為敵人，會危及人類的健康，因此對抗 Zika 成為全體人類的共同目標（Ribeiro, Hartley, Nerlich, & Jaspal, 2018）。討論伊波拉病毒時，媒體著重在社會政治框架與人情趣味框架，疾病管制局的框架著重在疾病定義、症狀與治療，兩相比對則發現民眾與政府的框架落差（Kott & Limaye, 2016）。美國的流感報導多使用「後果」框架；南韓在癌症原因的報導中，後果框架卻不是主要框架（Dan & Raupp, 2018）。同樣是 H1N1 的報導，美國多使用咎責、行動（action）等積極態度的框架，呈現政府或個人都

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疾病；韓國媒體卻不見積極框架，而著重疾病的發展與趨勢，兩國的態度落差可能與亞洲國家普遍抱持宿命論有關（Oh et al., 2012）。

在 SARS 的報導上，各國不同程度的使用咎責框架、人情框架、經濟後果框架。美國報紙比中國報紙更常使用咎責框架多將責任歸咎於社會與政府，美國報紙尤其責怪中國政府造成 SARS 的擴散。中國報紙則正面報導中國領導人承擔責任，積極處理 SARS 帶來的經濟與健康危機（Luther & Zhou, 2005）。美國報紙更強調衝突、經濟的負面影響，但中國報紙則強調 SARS 期間社會穩定、風險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中美報紙同樣使用人情框架，但美國報紙著重負面故事（受 SARS 影響而生活困頓、過世的人情故事）；中國報紙則強調 SARS 的英雄事蹟（同上引，2005）。

可見不同國家、不同傳染病在報導上使用的框架有所差異。各地的政治體制、新聞專業常規、文化價值、社會觀念有所不同，以致於對疾病呈現的重點也不同（Luther & Zhou, 2005; Oh et al., 2012）。但是，目前無法歸納各國在健康風險報導上使用框架的規律性（pattern, Dan & Raupp, 2018），這可能與先前研究所關注的傳染病不同，直接比較不同傳染病的研究發現難以歸納出規律性。再者，多數研究使用的框架是採用文獻已有的框架，情境不同下，不一定每個框架都適用。針對這個問題，目前傳播研究開始使用主題模型分析，不以文獻既定的框架為主，而是從研究樣本中直接歸納出不同框架，如此找出來的框架更符合該傳染病的時空脈絡。框架原用於分析媒體報導，本文用以分析網路上的公眾論述。因此，本篇採用主題模型分析，從網路文本歸納出臺灣網友對 COVID-19 的論述框架，以理解民眾對 COVID-19 的風險感知，並提供脈絡化的認識。社群媒體是民眾搜集疫情訊息、發表或參與討論的管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道，也是反映民眾對 COVID-19 的態度的重要平臺，有鑒於批踢踢的八卦板與政黑板是 COVID-19 的熱門討論板（詳細說明請見研究方法），本研究針對此兩板，提出研究問題一：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論述框架為何？

二、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風險溝通的效果不彰，往往因使用的詞彙誤導或混淆讀者的關注焦點（Hauser & Fleming, 2021）。語言與文字建構人們對風險的認知，形塑民眾看待風險的觀點與態度，讓受眾無意識地接受特定觀點（Lakoff & Johnson, 1980）。概念隱喻理論能幫助我們觀察訊息如何與為何如此建構，該理論認為：從文字、文化與情境來解讀隱喻，可以看出言說者的思維與價值觀（Gibbs & Franks, 2002）。承研究問題一，找出網友的論述框架僅能反映描述性的結果，透過分析網友的用字遣詞，能夠深入了解網友的思維如何建構 COVID-19 的認知，因此，本文採用概念隱喻理論，觀察民眾感知到的 COVID-19 疫情風險，透過什麼樣的隱喻與文字建構出來。

（一）概念隱喻理論的基本概念：來源領域、目標領域、映照

概念隱喻理論中的「概念」（conceptual），指的是「人們理解、認知的概念」，其關注人們透過隱喻形成對抽象事物的概念，為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理論之一，由 Lakoff & Johnson 在 1980 年提出。多數人認為隱喻屬於文學修辭的研究範疇，但 Lakoff & Johnson（1980）認為，隱喻不只限於文學作品，而是大量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例如：日常用語中的「出軌」不是真的講火車脫離軌道，而是在講婚姻關係中有了第三

者。「劈腿」不是真的指涉劈腿的動作，而是指同時與不同對象交往。隱喻是人類認知的重要方式，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讓大眾容易理解，進而形成知識。概念隱喻理論的三個要素為來源領域（source domain）、目標領域（target domain）、映照（mapping）。用 A 隱喻 B，A 為來源領域，多半是某一具體的生活經驗，B 為目標領域，多半為抽象概念。例如「火冒三丈」與「七竅生煙」是日常生活中很常見的「隱喻」：利用火比喻生氣，火為來源領域，生氣為目標領域，火類比為生氣的關聯即為「映照」。起火的比喻借用火燒的情境讓人理解生氣的狀態，亦即生氣的狀態與火冒煙、熱度、燃燒等現象符合。使用不同事物類比同一抽象概念，會帶來截然不同的態度與相應的行為。

不同的文化使用不同來源領域的隱喻辯論，反映各種文化對論辯的不同觀點。Lakoff & Johnson（1980, pp. 454-456）舉例：我們的文化認為「辯論是一場戰爭」。以戰爭隱喻辯論，人們利用戰爭的概念理解辯論，亦即辯論有輸贏。人們使用戰爭的用詞進行辯論：「攻擊」對方論點、「防衛」我方論點。說服對方的策略視為「戰術」。如果攻不下對方論點，就開啟另一個「戰場」。然而，另一個文化用跳舞來比喻辯論，看待辯論的觀點就會不同。這個文化把辯論的雙方視為表演者，不認為辯論有輸贏、有攻擊、有防衛，而認為辯論是一種平衡與美感。用這種觀點辯論就有不同的態度與作法。因此，用不同的來源類比同一個目標，形成截然不同的觀感。概念隱喻理論關注我們選擇來源領域的什麼概念，對應目標領域的抽象概念。

「映照」是系統性的建立來源領域與目標領域之間的相似性與關聯，這是「理解」（reasoning）、類推（inference）、建立認知的過程。例如「我們的愛情走到了盡頭」，把愛情比喻為一段旅程，映照為愛情與旅程相似的對應關係。用旅程的人事物對應愛情的人事物：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 戀人如同旅客
- 愛情關係如同交通工具
- 戀人的共同目標如同旅程的共同終點
- 關係中遇到的困難如同旅程中遇到的阻礙

映照創造來源領域、目標領域之間共同點，並合理化之。如上例，強調愛情與旅程的共同點。又例如「愛是合作的藝術」的隱喻來自生活經驗，隱喻的「映照」效果連結兩個不同領域的概念（愛、合作），即使每個人的經驗各異，也可大致認同這個隱喻（Lakoff & Johnson, 1980）。越普遍的生活經驗類比，越容易被大眾接受。

映照是獨斷的，不需解釋為什麼來源領域與目標領域有共同點，只要藉由日常生活經驗，由讀者用對來源領域的觀感來理解目標領域，類推抽象概念。在 A 與 B 的連結過程中，意義被建構。因此，映照可以把來源領域的價值觀與好惡移轉到目標領域。

來源領域的所有元素與關聯不需要全部對應到目標領域，只需要部分對應產生關聯即可，因此映照有意的強化、隱藏某些面向（Lakoff & Johnson, 1980）。例如當我們用戰爭來理解辯論，我們著重於攻擊與防衛、你輸我贏，卻忽略「合作」與協調。如果用合作與協調的眼光看待辯論：表示對方願意花時間（珍貴的資產），尋求的是相互理解，而不是辯倒對方（同上引，p. 456）。

（二）概念隱喻創造虛擬真實

透過來源領域類比目標領域，以及兩者的映照關係，隱喻有助於理解抽象事物。但是，無形間形塑大眾對抽象概念的認知，決定我們對事物的理解與觀點。隱喻使用特定的來源領域、強調與忽略特定的映照關

係，建立抽象概念的知識。不同的類比，不同的映照關係形成不一樣的認知與觀感，當受眾對目標領域的概念沒有足夠認識時，來源領域成為先入為主的先備知識，讀者不自覺得用來源領域的概念、喜好、態度理解抽象概念（Hauser & Fleming, 2021）。

隱喻建構虛擬真實。當我們用具體事物類比抽象事物，建立人們的認知，即創造一個隱喻的真實（metaphorical reality）（Kövecses, 2018）。隱喻創造不同的真實，人們依照自己感知的不同「真實」，產生不同的態度與行為（Lakoff & Johnson, 1980）。隱喻廣泛用於疾病醫療（Gibbs & Franks, 2002）、天災風險（Hauser & Fleming, 2021; Larson, Nerlich, & Wallis, 2005）、政治溝通（Lakoff, 1996; Musolff, 2004）。透過隱喻影響認知、操弄情緒、建立認同。

在疾病醫療上，不同的隱喻疾病產生不同的認知與心態。解釋疾病的文件常使用軍事用詞而招致批評。例如：癌症是一場戰役，隱喻病況是「殘忍無情」、「被偷襲」、身體被癌細胞「殖民或攻占」。此種隱喻讓患者悲觀地看待疾病，未戰先敗，覺得自己是戰俘、失去治療癌症的動力。傳達要克服萬難才能抵抗疾病的比喻，對天性樂觀的患者可能有用，但是天性較怯弱的患者聽了壓力更大（Williams Camus, 2009）。然而，樂觀用詞帶來積極的心態。樂觀的病人把癌症比喻為「人生旅途中的障礙」，而非「旅途的終點」，意味著可以有計畫的治療癌症，有康復的機會，一旦「障礙移除」，又可以回到「正軌」（Gibbs & Franks, 2002）。研究發現，這些樂觀的病人以更積極的心態面對疾病。他們不認為癌症是隨機的（不問「為什麼是我」），而認為癌症是有意義的，如同生命的提醒，他們要更注重生活的平衡、健康飲食、與家人間的關係、或放慢生活的步調，他們也期待，康復的時候會重返更健康的生活（同上引）。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同理，在疾病醫療文件中，使用不同文字描述死亡會帶來不同感受。例如使用「平靜的接受死亡是一個人的旅程終點」形容死亡，與「將疾病視為敵人、戰役、掙扎、奮鬥」形容死亡，讓人對死亡的感受不同。因此，英國的政策文件已避免使用暴力、戰爭相關的用詞（Demmen et al., 2015, p. 207）。

感染 Zika 可能導致生出畸型兒，在巴西的 Zika 論述中，隱喻女性有主動採取避孕措施的主要責任，女性因而認為自己有更高的感染風險而更積極防疫，而男性則輕忽自己的責任，導致全民應該共同防疫，卻變成女性的責任（Ribeiro et al., 2018）。媒體常使用戰爭隱喻疾病與政治，例如 SARS、IS 都以殺手、進攻為隱喻。殺手帶來實際身體的苦痛來隱喻，其隱喻提升人們的對 SARS 與 IS 的重視程度，也容易激起實際行動，如同作戰般的對抗（Larson et al., 2005）。強制繫上安全帶的政策以「違反個人隱私」為隱喻時，會讓較多民眾反對繫安全帶的強制令，認為是否繫上安全帶是個人自由，但是否有安全顧慮則被民眾忽略（Read et al., 1990）。這就是隱喻的強調與隱藏特定面向的效果。

隱喻可以建構愉悅、恐懼、嘲弄、蔑視等各種情緒（Kövecses, 2018）。汽車廣告中的車主擁抱他的車，愛車如同愛家人，把對家人的情感轉移到對車子的愛，隱喻車子好到如同心愛的家人，營造滿意愉悅的情緒，實際上是為了增加新車銷售量。在政治演說中，隱喻激起聽眾強烈的情緒與好惡，也讓聽眾快速地接受用特定框架理解複雜的政治議題（Read et al., 1990）。

隱喻出現在臺灣的兩岸認同論述。將「兩岸統一」隱喻為「災難」，把災難帶來的傷亡、財物損失的迫害感轉移到「兩岸統一」帶來的後果。建立認同時，須先區分我族與他者。媒體以「惡漢搶親」隱喻「兩岸統一」，以黃花閨女隱喻臺灣、惡漢隱喻中共、老鴿隱喻美國，

美國的外交政策如同臺灣的賣身契。隱喻美中臺關係中，臺灣孤立弱勢（閩女），惡漢與老鴿都是壞人，屬於敵對的他者，孤立弱勢的主角則為我族。標示邪惡的他者，以建立對我族的認同（張玉佩，2000）。

（三）概念隱喻理論小結

網路論述的語言與文字不只是溝通的基本工具，透過隱喻、連結不同概念，創造不同的真實（Kövecses, 2018）。概念隱喻是多數人認同、習以為常的類比，因為來自於共同經驗。日常生活中的隱喻是約定成俗，很少經過論辯與挑戰，大眾在不自覺得狀況下用既定的觀點看待事物（Lakoff & Johnson, 1980）。要找出我們透過什麼隱喻來理解這個世界，就要透過文字來找出我們用什麼隱喻、從隱喻中找出我們對事物的「概念」。

隱喻可以創造公眾，將一個事件成為公眾議題。為了普及化複雜專業的議題，使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轉化艱深的議題。轉化的方式有三：重新命名（denomination）、重新解釋（擴張強調或忽略某部分）、情境化，即使用大眾熟悉的例子類比艱深難懂議題，容易讓人理解，但也可以加進特定價值觀、正面或負面的看法（Williams Camus, 2009）。

轉化的過程中，牽涉到內容創作者的目的、對接收者的理解程度、文化背景、價值觀的判斷，而選擇不同的用字，過渡（偷渡）價值觀，影響民眾如何看待該議題。因此，選擇什麼樣的隱喻與文字很值得關注。

隱喻更傳達文化與價值觀，文字使用的背後往往有複雜的權力競逐，爭奪詮釋的觀點（Williams Camus, 2009）。隱喻決定民眾對抽象概念的觀點與態度。可是，日常生活中的隱喻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與討論（Lakoff & Johnson, 1980）。網路上的討論可見許多習以為常的隱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喻，社群媒體之所以成為很多人了解複雜議題的來源，是因為網友的用字遣詞接地氣、淺顯易懂、使用相同的語言，讓受眾更容易理解複雜的議題，也形塑民眾的認知與觀點。

三、修辭生態學 (Rhetorical Ecologies)

雖然網友的用字遣詞無形中傳遞不同價值觀。不過，並非提出就可被大眾接受、成為公眾議題。公眾論述中，語言的意義隨著內容創作者與接收者的互動、共享的情境與文化變動，直到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即產生出共識 (Edbauer, 2005)。本研究問題一歸納出的論述框架為最常出現在網友討論的框架，也是較受網友關注的議題，可說是多數網友在意的公眾議題，修辭生態學有助於進一步解釋，公眾議題如何從廣泛的討論中浮現。

修辭生態學如同生態體系，是一個議題冒出、擴散、又不停的循環（再製）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個修辭（說法）不會無緣無故自己擴散，而是在某種社會氛圍下，產生讓人一拍即合的說詞。隨後，這個修辭在公眾間就會開始發展、吸納更多的觀點、呼應、回應，民意的風向開始發展得更符合大眾想法，再度吸納更多的認同。最後發展起來的修辭（說法）可能與先前的不同，但是因為符合更多數人的想法，達到關鍵數量後，產生樂隊花車的效果，讓更多大眾認為這就是目前的社會氛圍，而創造更多認同。

事件成為公眾議題的要素有：修辭（語言的使用）、公眾、緊急危機（*exigence*）（Edbauer, 2005）。語言的使用可以創造公眾、引發危機感，而進一步的創造認同。例如：曹開明、劉大華（2019）研究國防部製播的同志戲劇在網路上引起的公眾討論，發現：公眾論述點出此部

同志戲劇帶來的危機：如軍中的性別、同志議題值得更多重視，危機引發公眾關注，在網友的相互回文中，擴展事件的意義，衍生出挺同與反同的兩派言論，挺同方共創出嘲諷反同團體的論述、反同方共創出歧視同志的笑話，一齣軍中同志戲劇引發挺同反同兩派的認同對立（同上引，2019）。

公眾溝通傾向一個穩定恆常的關係。為了要產生共識，使用能支持或放大單一論述的語言而忽略全貌（Edbauer, 2005）。媒體如此，公眾討論尤是。網路論述的語言加上情緒召喚認同，再由接收者呼應、強化、再認同。所以網路論述並非客觀呈現議題的複雜性，而是藉由轉譯複雜的議題帶動集體化認同。因此，透過修辭，公眾論述的重點不在於事實是什麼，而是大眾願意集體相信什麼。語言創造真實，讓事件在公眾的認知中顯著，並影響民眾態度。

綜上所述，社群媒體是探討民眾對風險治理的態度的重要管道。COVID-19 是專業生硬的公衛健康議題，且屬於緊急危機，很容易成為公眾議題。然而，意義的產生來自內容創作者與接收者的彼此互動。本研究除了觀察臺灣民意如何理解呈現 COVID-19，進一步借用概念隱喻理論與修辭生態學，觀察網友如何藉由 COVID-19 使用隱喻，轉化、傳遞什麼樣的價值觀與政治認同。修辭生態學適合作為分析社群媒體上的 COVID-19 公眾論述的觀點，觀察議題消長，以及如何引發認同。修辭生態學在創造認同的面向仍屬初步階段（曹開明、劉大華，2019）。本研究將從 COVID-19 的網路論述中，提供認同化的經驗資料，繼續發展修辭生態學的認同概念。也根據臺灣網友的討論特性，嘗試提出一個更適合分析公衛健康議題的公眾論述模式。因此本研究從概念隱喻與修辭生態學的角度觀察批踢踢的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如何討論？討論的主題間有何關聯？提出以下兩個研究問題，以了解民眾如何討論疫情。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研究問題二：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各主題討論情形為何？

研究問題三：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討論主題間呈現出什麼關聯？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網路論壇——臺大 PTT 實業坊（批踢踢）中的八卦板與政黑板，擷取 COVID-19 相關的貼文。批踢踢為目前臺灣最大、使用人數眾多的電子佈告欄（Bulletin Board System，簡稱 BBS）（林思平，2017）。根據批踢踢站內的統計數據，2013 年，批踢踢的總註冊人數為 200 萬人，單日上線人數最高紀錄超過 1158 萬人次、一個小時同時上線人數最高紀錄超過 498 萬人次（PTT 實業坊，2022 年 9 月 17 日），因此，批踢踢是觀察網路輿情的重要平臺之一。政府部門亦觀測批踢踢，以了解民意，作為發展、修正政策的基礎（國家發展委員會，2017）。網友在批踢踢上發表的文章與回文，時常成為熱門社會話題，更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重要素材。媒體經常引述批踢踢網友的意見，以展現民意（林思平，2017）。其中八卦板與政黑板更是熱門討論板，常居於熱門看板列表。尤其八卦板內容常常成為新聞內容，也是批踢踢中，創下討論時事話題人數最多的板，板上同時超過十萬人（PTT 鄉民百科，無日期）。可見八卦板與政黑板是批踢踢中，使用人數較高、對時事議題討論最熱烈的討論板。八卦板言論也是媒體觀測民意的指標（林佳賢，2019 年 4 月 23 日）。COVID-19 在中國爆發之初，2019 年 12 月 31 號在八卦板上的一篇 COVID-19 文章，開啟國內衛福部對疫情的關注（黃雅琪，2020 年 4 月 16 日）。西班牙與義大利媒體亦報導此事件，並認

為批踢踢如美國最大論壇 Reddit，為重要的民意觀察來源（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30 日）。COVID-19 與政治話題也一直是八卦板與政黑板的熱門討論議題。本研究主要關注臺灣網路民意如何討論與形塑 COVID-19，並理解民意如何感知政府的防疫政策，因此選擇批踢踢中使用人數為多、討論熱烈且大量討論 COVID-19 的八卦板與政黑板。

本研究擷取提到關鍵字：「新冠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的主文，以及該主文底下的回文與推文。日期從中國武漢通報的第一個案例開始，2019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8 日。共 208 萬 8546 筆資料。本研究採取主題模型分析檢視，針對 COVID-19，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討論了哪些議題？如何討論這些議題？再採用主題網絡分析了解這些議題之間有何關聯。

一、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主題模型分析 (Topic Modeling)

本研究使用主題模型分析回答研究問題一「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論述框架為何？」。主題模型分析為非監督機器學習方法，使用貝式生成模型 (Bayesian Generative Approach) 處理文本分析，是目前傳播領域分析大量文本的常見方法 (Guo, Vargo, Pan, Ding, & Ishwar, 2016; Lewis, Zamith, & Hermida, 2013; Walter & Ophir, 2019)。主題模型分析的好處是可以處理同一個字在不同情境下的意思、計算共同出現的機率，比其他機器學習的方法還要透明。使用機器學習的方法可降低研究者的偏見、節省時間與金錢分析大量文本 (Walter & Ophir, 2019)。

主題模型分析最常見的兩種方法為特徵向量 (Term Frequency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F-IDF)¹與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LDA 是傳播研究普遍使用的演算法 (Guo et al., 2016; Shahin & Zheng, 2020)。LDA 使用共詞分析 (co-occurrence analysis)，可以快速辨識出辭彙出現的規律，與其他共詞分析的研究法相較，LDA 能準確的顯示字句之間隱而未現的潛在框架。例如，這些字詞沒有同時出現，但是彼此出現的頻率與次數有一定的規律 (Maier et al., 2018)，並且顯示隱藏在文字當中的主題。

「主題」(topics，不是指網友的主文與回文)模型不個別分析每篇主文回文，而是打散所有的主回文，計算字詞共同出現的頻率與機率，把常一起出現的詞集合起來為一個主題 (Blei, 2012)。語言學的假設是常一起出現的詞可反映出文本的某個面向。每一個主題包含常出現在這個主題的詞彙，由機率高到低排列。主題模型分析依據統計運算的結果，標示出特定詞組與其對應的文本。換句話說，主題模型分析運算法，首先定位出文件 (documents) 的最小單位—詞 (word) (同上引, 2012)。由於文本內容與詞彙的語意相關，因此可推論某一詞組通常會出現在意義類似的文本中，屬於某一類型主題。依此假設，主題模型分析，依據高頻詞產生對應文本，進而挖掘文本的主題 (Blei, 2012; Walter, Ophir, & Jamieson, 2020)。每一文本可包含多個主題。

但是 LDA 只能找出主題，無法找出各主題背後呈現的關聯，況且主題數量由研究者先行決定，不見得是最佳主題數量。Walter & Ophir (2019) 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專門分析框架的機器學習分析方法——ANTMN (The Analysis of Topic Model Networks)，結合主題模型與網

¹ TF-IDF 指的是藉由比較字詞在特定文本中的出現頻率與字詞在所有文本中的出現頻率，以了解字詞的重要程度 (Ramos, 2003)。若某一字詞較常出現在某一類文本中，那麼該字詞的特徵向量較高。然而，若某一字詞在不同文本中出現的頻率皆很高，該字詞的特徵向量則變低，例如介系詞 (同上引)。

絡分析，將主題視為一個節點（node），主題之間的關係看成線（edge）。首先，使用主題模型找出文本中呈現的各個主題。第二，根據詞彙共同出現的頻率計算主題之間的關聯，即這些主題共同出現的頻率多寡來看主題與主題之間的關聯強弱，呈現出主題之間的網絡。第三，依據社群偵測（community detection），合併類似主題。根據理論已出現的框架，命名框架，或者歸類為議題特定框架。LDA 無法根據主題相似程度，歸納出框架。使用 ANTMN，不僅可根據困惑度（perplexity）的值跑出最適配的主題數量，再根據主題的相關程度產生框架。如此，我們可以分析出文本呈現哪些通用框架（general frames），哪些 COVID-19 的議題獨有框架。

二、主題網絡分析（Topic Networking）

本研究參考 ANTMN 主題網絡分析回答研究問題三：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討論的熱門主題之間的關聯。主題網絡分析可以看出網路論述呈現的「主題」，形成哪些討論框架。主題網絡顯示主題間的相關程度，再根據各個主題共同出現的機率，歸類成一個集群（cluster），即為框架。框架底下的各主題呈現類似的事件或意義。本研究利用 θ 矩陣，觀察每一個文件呈現的主題與共同出現的頻率與機率（Maier et al., 2018）。在該矩陣中， θ 代表某一文件在各主題下出現的可能性。藉由將每一文件在各主題中出現的機率形成矩陣，進而將文件與字詞分類在各主題中。 θ 矩陣的橫排為文件、縱排為主題，也就是文件上的主題組成比例。藉由兩相對照可以計算出主題之間的距離、共同出現的頻率多寡、與彼此間的相似程度，也可以估計各詞彙共同出現在同一文件的程度。我們使用成雙餘弦相似性（pairwise cosine similarity）產生主題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網絡。節點為主題、線為兩主題共同出現的機率（相關程度介於 0-1 之間）（Ophir et al., 2021）。最後使用 Louvain 把高機率同時出現的主題合併為「框架」。Louvain 為社群偵測的一種運算法，其核心概念是在一個群組中的某一節點，與群組內的其他節點的互動程度，會比與群組外的節點高。在方法上，藉由將任一節點分配到某一社群，並以最大化代表網絡模組（Network modularity）的 Q 值為目標。當 Q 值無法再優化時，代表社群分類完成（De Meo, Ferrara, Fiumara, & Provetti, 2011）。

三、分析步驟

本計畫使用 R 裡面的 LDA 與 LDA tuning 套件。首先清理文本：去除中文停用詞、虛詞、無意義的符號，去除出現在超過 99% 的文本中與出現不到 0.5% 的文本的詞彙。第二，根據統計最佳配適度（model fit）決定文本中最佳的主題數量。決定主題數量與模型的過程非常冗長瑣碎，本研究根據 Walter & Ophir（2019）的建議，依序跳過 10 個主題在 10-100 的模型、20 個主題在 120-200 的模型以及 2 個主題在 250-300 的模型（同上引，2019）。接著根據模型配適度指標決定最佳主題數量。配適度選擇標準為準確度（accuracy）、密度（density）與困惑度指標選擇最小的（Arun, Suresh, Madhavan Veni, & Narasimha Murthy, 2010; Blei, Ng, & Jordan, 2003; Cao, Xia, Li, Zhang, & Tang, 2009）。困惑度為計算任一主題數量模型出現之機率的統計方法，其核心概念為比較各主題下的字詞分布與實際樣本中的字詞分布之情況（Smyth, Welling, & Asuncion, 2008）。一般而言，困惑度越小，代表該主題數量模型越佳（Asuncion, Welling, Smyth, & Teh, 2012; Smyth et al., 2008）。本研究比較 30、40、及 50 個主題數量模型，當主題模型為 50 時，其困惑度為

三者中最小 (perplexity=1055.2)，顯示 50 個主題為最佳數量，因此本研究選取 50 個主題的主題模型作為分析對象。

跑出主題之後，產生各主題對應的文件，這些文件為各主題的文本內容。接下來，由兩位研究者，根據文件與高頻詞命名主題。從三十個高頻詞歸類出文本討論的事件，輔以每一主題的前 20 則貼文作為命名主要參考文本，抽取可包含文本的概念，以確立主題名稱。例如，習近平政權主題根據高頻詞：「問卦」、「習近平」、「帶風向」、「中共」、「美國」、「世界」、「還能多久」、「國家」，搭配文本內容提到「看其內容就知道大外宣在帶的風向是什麼。前幾天帶的風向是美國來的人造病毒。」、「看這次的武漢肺炎就是行政問題、醫療資源不足、為了維穩只跟美國講」、「中國境內網站的爆卦截圖，為何常會有紅色塗鴉？」、「最近武漢肺炎的消息滿天飛，有許多支那政府會崩潰的截圖畫面，大量流出」，歸類這類框架關注疫情對習近平政權的影響、中國內部的疫情風向，因此命名為「習近平政權」。

肆、研究發現

一、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公眾論述框架：兩岸關係、臺灣防疫政治、國際疫情

本研究回答研究問題一：「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論述框架為何？」，發現這兩板的 COVID-19 討論呈現三個框架：兩岸關係、臺灣防疫政治、國際疫情（見圖 1）。

「中國隱匿」、「疫情擴散連累各國」圍繞在病毒源自中國，中國隱匿實際疫情，應為全球疫情負責。流言主題多為醜化中國的 COVID-19 謠言為主，因為中國隱匿消息而使得疫情相關流言甚囂塵上，中國內部政權因疫情而出現變動（例如「習近平政權不穩」）。在臺灣與中國同時出現的討論上，則有較勁或優越的意味，例如臺灣政府防疫勝過中國、臺灣的生活較中國生活自由安心。即使討論傳染途徑，網友反諷中國科學家與衛生官員的說法，挖苦中國。網友並非實質討論病毒的傳染途徑，而是強調 COVID-19 起源中國，擴散全球，以及中國政府對疫情的隱瞞。

在防疫成果的比較上（臺灣防疫佳），對比中國，言論多為對臺灣政府防疫成果歌功頌德的討論。例如「臺灣政府官員的記者會即時公開新增病例原因，反觀中國，出事就隱瞞，習包仔神隱，官員神隱，病例更新作假」。然而，「臺灣政府控管防疫言論」主題則呈現強烈對比，指出臺灣防疫成果為政府的網軍與側翼帶風向，一面倒批評臺灣政府控管言論。討論立場正反並陳的出現在「美中臺」主題。此討論串多出現中國政府對臺灣武統的可能性，以及美國是否保護臺灣。有認為中國武統臺灣可能性高，也有認為美國會介入臺海戰爭，無需恐慌。

總結來說，兩岸關係框架的討論，多關注「小道消息」或「官方未公開」的訊息、對中國的指責、貶抑與不信任。有趣的是，與臺灣政府防疫相關的討論出現政治立場兩極的主題，一為指責臺灣政府防疫不力，又動用網軍與側翼團體帶風向轉移焦點；另一則對臺灣政府的防疫成果歌功頌德。在討論美中臺主題上，同樣呈現親美與反美兩極立場，親美派對美友善，認為在臺海衝突會保護臺灣；反美派則對美有敵意，認為美國不會幫助臺灣。

（二）臺灣防疫政治框架（橘色）

此框架以臺灣疫情、防疫政策、疫情影響生活的嚴重性來論辯政府、政黨與政治人物的適任性，多屬泛政治的討論。

首先，在臺灣境內的防疫工作上，有四個主題模型以口罩為主，如「口罩分配」、「口罩物資」、「口罩外交」以及「是否戴口罩」，不僅顯示「口罩」在臺灣防疫上的重要角色，也顯示口罩似乎作為政府防疫的核心。隨著本土確診案例增加，「是否戴口罩」、「口罩物資」與「口罩分配」成為話題，顯示在臺灣社會中，口罩是作為預防傳染病的重要角色。這些討論反映網友在臺灣疫情未爆發前，對「在哪裡」、「誰」需要戴口罩的態度，及民眾認同口罩作為防疫時期阻斷病毒傳播的必要物資，甚至是防止疫情擴散的解決之道。此種高度信賴口罩的態度，不僅刺激臺灣境內對口罩的需求，同時促使「口罩國家隊」孕育而生，投入大規模的口罩製作，甚至形成疫情期間獨特的「口罩外交」。

本研究發現，網友對臺灣的防疫論述，以口罩為主軸，對應政府的防疫政績，如口罩地圖、口罩國家隊，因而促使民眾高度關注口罩議題並呈現正反立場，如質疑口罩外交的適切性與分配原則之輿論，或對口罩國家隊抱持肯定與對口罩外交具有光榮感的聲音。

此種將防疫、公共衛生傳染防治鑲嵌至政治的討論上，同時展現在討論臺北市政府與中央防疫的貼文與留言中。此框架底下的 22 個主題中有六類主題與政治人物、政黨息息相關，例如「柯文哲」、「指責韓國瑜」、「政治人物支持度」，顯示民眾熱衷政治人物與政黨在防疫政治的討論。其中「地方中央對立」、「北市中央政治對立」、「北市中央防疫不同調」，描繪出臺灣防疫政治的核心角力運作場域。例如針對疫情趨緩，酒店與舞廳是否開放，中央授權地方決定。這類討論將臺北市政府與隸屬中央單位的疾病管制局一分为二，藉由對比地方與中央、

強調柯文哲與烘托陳時中，描繪縣市政府與中央在防疫工作的權力分配，同時勾勒出政治明星的角力現場。具有政治意涵的討論大於防疫本身的討論，充斥於這四類主題模型中，顯見網友將政治鑲入防疫與公共健康議題的討論。

屬「政治新聞」主題類型下的貼文與留言，同樣呈現出防疫與政治融合的樣態，例如「防疫政策的優劣」、「政治人物表現」。在疫情下的政治新聞將疫情置入政治優先的論述模板中，探討防疫政策的優劣與政治人物表現。例如新聞報導「柯偷爆料武漢包機返臺安置處」以及「蘇貞昌逆時鐘」，引發網友選邊站，表態對政治人物的好惡。以政治人物支持者自居，但反對自己的支持者、或者改支持另一陣營，讓留言看起來更中立、更具說服力。如「雖然我是超級白柯粉，但在這件事情上（曝臺商隔離所）²，我要罵柯文哲」。

此外，疫情與經濟尤其成為民眾關切的議題。「紓困」與「振興經濟」甚至「宗教」活動皆是民眾討論臺灣本土防疫的話題。與經濟相關的議題討論，研究發現，前 30 則文本中多為新聞報導，顯示民眾對經濟的討論，以新聞報導作為重要的消息來源與意見分享指標，較少個人看法。反之，「大甲媽遶境是否暫緩」的宗教議題討論，以網友的個人看法為主，在前 30 則文本中，最常出現的多為網友闡述己見的內容，顯示宗教議題的討論以網友的個人意見為主，經濟則以新聞為主。

（三）國際疫情（紫色）

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把疫情與防疫政策置於國際脈絡下討論，疫情

² 疫情初期，時任臺北市長柯文哲曝露武漢臺商回臺的隔離地點，引起批踢踢網友正反意見討論，網友也表態支持或反對柯文哲（梁珮綺、張茗喧，2020 年 2 月 2 日；袁茵，2020 年 2 月 4 日）。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爆發的前八個月，臺灣主要案例多為境外移入，因此網友多關注境外移入案例、各國疫情、國際旅遊禁令、病毒起源與相應的防疫政策。國際疫情的討論仍不乏「咎責」與「泛政治」的討論，焦點則放在各國、世衛、中國的責任。例如「圍剿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主題提到：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拒絕臺灣加入，並多次提到臺灣回報疫情時，沒有提到人傳人，促使網友一面倒的責罵譚德賽，批評譚德賽作為不力，導致疫情擴散全球、幫助中國隱匿疫情、呼籲各國合作罷免譚德賽。

在各國疫情（國際疫情、境外移入案例）主題上，網友從境外移入案例關注國際疫情變化、國際旅遊。每日的疫情記者會是主要消息來源。義大利、德國、馬來西亞、英國、日本的移入案例與疫情受到網友的重視。網友關注各國的旅遊警示措施，反觀臺灣該怎麼做。在應對措施上表現出對政府篩檢政策的不滿：例如是否擴大篩檢、擴大篩檢到萬人的必要性，如「臺大造反逆時鐘，偷驗萬人」，亦也批評口罩分配政策與症狀採檢政策。

有趣的是，國際疫情框架與兩岸關係框架都討論到疫情起源於中國。兩岸關係框泛論 COVID-19 是否起源中國。國際疫情框架聚焦在「武漢實驗室」與「野生動物」。討論立場上，與兩岸關係框架一面倒的反中不同，國際疫情框架的立場親中反中皆有。

在「武漢實驗室」的討論上，一派網友關注該實驗室是否有人為疏失、是否研發生化武器、咎責中國，引發正反論戰。反對方網友點名西班牙、美國等國家也為流行病發源地，卻無賠償全球或道歉，為何只咎責中國。這類討論圍繞在親中反中立場，論戰中國是否該為新冠病毒負責。

整體而言，國際疫情框架從各國疫情、國際間的狀況來看臺灣疫情、確診個案、邊境措施，中國、臺灣如其他主題一樣為高頻詞，立場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以網友討論量（主文、回文的則數）來看，每個主題的討論數量差異不大，從 1.43% 到 3.3% 之間（見圖 2）。但如果看網友討論最多的前十名主題中，有七個屬於兩岸關係框架，圍繞在中國隱匿疫情、中國是疫情源頭、中國擴散疫情連累各國、習近平政權。臺灣防疫政治框架有兩個、國際疫情框架一個，顯示民眾主要使用兩岸關係的觀點討論疫情（討論的事件集中）。唯一的國際疫情框架的主題「確診新聞」，卻是 50 個主題中討論最多的，可見網友最關心國際間的確診狀況，了解疫情實際發生狀況。

表 1：討論量最多的前十個主題與框架

討論排名	框架類別	主題名稱	出現百分比 (%)
1	國際疫情	確診新聞	3.3
2	兩岸關係	流言	2.66
3	兩岸關係	習近平政權	2.62
4	兩岸關係	指責中國疫情源頭	2.52
5	臺灣防疫政治	北市中央政治對立	2.51
6	兩岸關係	疫情擴散連累各國	2.41
7	兩岸關係	中國隱匿	2.27
8	兩岸關係	臺灣防疫佳	2.26
9	臺灣防疫政治	宗教（大甲媽祖遶境）	2.25
10	兩岸關係	疫情影響生活	2.24

同理，從討論量來看網友討論較少的前十大主題，口罩物資是網友最不關心的，依序為指責韓國瑜、各國疫情、紓困、磐石敦睦艦。以框架來看，網友最不關心的議題多落在臺灣防疫政治框架（七個主題），依序為國際疫情（兩個主題）、兩岸關係框架（一個主題）。

表 2：討論次數最少的十個主題與百分比

次數	框架類別	主題名稱	出現百分比 (%)
1	臺灣防疫政治	口罩物資	1.43
2	臺灣防疫政治	指責韓國瑜	1.5
3	國際疫情	各國疫情	1.54
4	臺灣防疫政治	紓困	1.56
5	臺灣防疫政治	磐石敦睦艦	1.57
6	國際疫情	訊息真偽	1.57
7	臺灣防疫政治	政治新聞	1.58
8	臺灣防疫政治	外籍人士使用健保	1.6
9	臺灣防疫政治	口罩外交	1.66
10	兩岸關係	中國傳染疫情	1.73

可見，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多從「兩岸關係」框架來討論 COVID-19，最少從「臺灣防疫政治」框架。以議題熱度來看，兩岸政治框架的主題數量少，卻最被網友熱議，可見網友從兩岸關係看待疫情的議題集中；臺灣防疫政治框架的關注焦點最廣（主題數量最多），但每個主題的討論文章量居中後。臺灣防疫政治框架中，討論最熱烈的主題是北市中央的政治對立與媽祖遶境議題。顯見批踢踢網友在臺灣內部疫情中，最關注的是政治對立與宗教。兩相比對發現，與防疫民生相關的主題（紓困、口罩物資、磐石敦睦艦）討論量少於與中國相關主題。追究疫情源頭與中國政權對臺灣的實質防疫並無直接關聯，但討論度卻遠多於與防疫民生相關的紓困與物資。顯示，對比於疫情其他主題，批踢踢網友在兩岸間的政治衝突討論較多。

以概念隱喻理論來看，本文關注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選用什麼來源領域對應疫情的目標領域，兩者的映照關係訴求什麼共同經驗？彰顯什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麼樣的立場與思維？

批踢踢上對疫情的討論不乏對臺灣政府的不滿。提到芒果乾，多半討論的是對臺灣政府的不滿。網友使用芒果乾反諷臺灣政府順勢運用疫情，利用亡國感建立民眾恐慌，提升對中國的敵意。當時臺灣因一個中國因素，加入 WHO 受阻，也無法以觀察員資格參與（BBC 中文網，2020 年 2 月 3 日）。友邦史瓦帝尼因在 WHO 發言遭主席打斷（陳佳鑫、謝其文、王興中，2020 年 2 月 4 日），網友認為，執政黨藉此打悲情牌，順勢操作為中國對臺的敵意，例如：「政府又是賣芒果乾起家的，兩個條件一拍即合，芒果乾大概可以熱銷幾年沒問題」³、「民粹芒果乾，這就是目前的臺灣擋不住的」、「民進黨政府鎖國挑釁中共賣芒果乾」。芒果乾是來源領域，隱喻「販賣亡國感」。除了芒果乾與亡國感有諧音之外，芒果乾是自產農產品，需經過生產與製造，隱喻亡國感是政府自產、自製「產品」；外銷臺灣自產農產品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隱喻臺灣政府「銷售」亡國感，政府向人民「宣傳」亡國感。網友使用「芒果乾熱銷」，隱喻政府創造的亡國感危機得到大眾認同。

表 3：芒果乾、亡國感的概念隱喻

來源領域	目標領域	映照關係（共同點）
芒果乾	亡國感	諧音
農產品	政治語言	亡國感是製造出來的
臺灣自產	政府自產	隱喻亡國感是自己的政府說自己要亡國
兜售	宣傳	亡國感是宣傳

³ 一個條件是政府擅長賣弄危機感，另一個條件是因中國因素，臺灣無法加入 WHO、世界衛生大會（WHA）與國際共同防疫。

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使用芒果乾與亡國感這兩個詞的相似性，將兩者類比，同時又呈現芒果乾與亡國感的二元矛盾，達到反諷意味。芒果乾是可愛美味的水果產品，享用芒果乾的情緒是歡愉的，對應亡國感帶來的威脅與恐懼，也就是說，臺灣農民自產的美味芒果乾，但政府極力銷售的是對國內民眾製造的恐懼。農民製造美好，政府製造威脅，也凸顯農民與政府的對立位置，農民的意象是弱勢、良善，與掌握權勢的政府是對立的兩邊，展現政府與民眾屬於不同族群。芒果乾是臺灣外銷的重要農產品，為臺灣帶來利潤，批踢踢網友藉此反諷政府，對內製造亡國感的恐懼。

表 4：芒果乾、亡國感二元矛盾

來源領域	目標領域	二元對立處
芒果乾	亡國感	美味的食物對比亡國的威脅
快樂	恐懼	以美好隱喻不好，凸顯對比達到反諷效果
農民	政府	政府與民眾不同邊
純樸	權力	掌權者利用農民宣傳恐慌
外銷	內宣	臺灣的外銷商品諷刺政府在國內製造恐慌

三、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討論疫情的核心主題為中國資訊不透明

回答研究問題三：「在社群媒體討論中，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對 COVID-19 的討論主題間呈現出什麼關聯？」本研究以主題網絡分析發現 50 個主題（nodes）產生 1225 條關係線（edges），在這 1225 條關係線中，能見度最明顯（visibility）的前 2% 的關聯中顯示（如圖 3），COVID-19 的討論呈現兩組議題關聯群。一為跨框架的討論群，一為臺

散全球。同時，網友連帶討論「習近平政權」，懷疑中國疫情影響到內部政權，以臺海開戰轉移防疫不力焦點。網友進一步將中國隱匿延伸到政治體制的透明與極權的相較，把中國隱匿與臺灣防疫政策、防疫成果對比。例如對比於中國資訊不充分、作假、官員神隱，歌功頌德討論臺灣防疫成果在於資訊即時公開透明。

在臺灣防疫政治框架上，「中國」成為指責對方的標籤。尤其是臺灣政府的防疫措施引來支持與反對政府的網友情緒化論辯。支持臺灣政府的網友將反對方標籤為「中國同路人」。因當時高雄市長韓國瑜親中立場鮮明，在防疫討論上也被貼上「中國」標籤。網友常比較臺灣與中國，以凸顯臺灣的優越。例如，在討論是否開放宗教繞境時，網友提及「中國封城，臺灣沒封城」顯示臺灣的疫情沒有中國嚴重，或是強調臺灣的政治體制不走封城。

在國際疫情中，呈現以「中國隱匿」為核心的議題串連模式，與「圍剿譚德賽」、「資訊監控」環環相扣。網友表達對世界衛生組織的不滿，包括世衛秘書長譚德賽指控臺灣的種族歧視，延伸至譚德賽的親中立場，進而對世衛所指稱的病毒起源抱持懷疑。「中國隱匿」、「圍剿譚德賽」、「資訊監控」的共同點為「政府管控資訊」。「資訊監控」提到習近平妻子彭麗媛被世衛秘書長譚德賽任命為組織一員，世衛官網沒有揭露彭麗媛與習近平的關係，呈現出「資訊不透明」與「世衛與中國的親近關係」。網友攻擊譚德賽的同時，透露對中國資訊不透明的質疑與貶抑。可知，網友認為中國隱匿疫情，連帶影響世衛的公信力。「資訊監控」的跨框架與「仇中言論」相關，顯示不少批踢踢網友在中國處理疫情上，非常在意「資訊不透明」。

第二個議題討論群為臺灣防疫政治框架內的關聯：柯文哲、地方中央對立、口罩物資。再次顯示，在臺灣內部的防疫政策上，多與口罩物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資的分配有關，地方政府作法與中央政策不一致，討論焦點則放在以臺北市長柯文哲與中央的政治攻防。網友感興趣的部分多為柯文哲發言批評中央政策。有趣的是，身為臺北市長的「柯文哲」主題非與「北市中央防疫不同調」主題相關，而是與「地方中央對立」相關，顯見柯文哲在網友的討論上不僅是地方首長的位階，而是被放在中央層級討論。而且，討論地方與中央對立時，柯文哲相較其他地方首長更受到網友重視。可能與柯文哲有醫學的重症感染科背景，在防疫上有專業可信度，加上政府的口罩物資政策不受到民眾信賴、柯文哲屢屢發言批評中央政策，得到網友重視。雖然討論的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攻防，臺北市長柯文哲卻是唯一，網友顯著提到的地方首長。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臺灣疫情初期時，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網路論述框架。以下首先說明網友如何感知、詮釋風險，進而探討 COVID-19 的討論用詞呈現的價值認同。研究結果發現，部分批踢踢網友借 COVID-19 為題，發揮對中國政府的指責與貶損，訴求反中派的認同。

本文貢獻為第一篇將 ANTEM 方法應用在中文文本。大部分的主題模型分析研究能分類出文本主題，本文結合 LDA 主題模型和網絡分析技術為基礎的 ANTMN 為分析方法，進一步找出主題間的關聯。不同於演繹式的框架分析，本研究將既有的傳染病框架，更細緻的分類出不同層次的政治框架。另外，「中國隱匿」是網友討論的眾多內容中浮現出來的公眾議題，本文借用概念隱喻理論與修辭生態學的概念，解釋網友如何藉由傳染病危機的討論，連結中國隱匿，創造政治認同，並提出

COVID-19 的公眾論述模式，擴充修辭生態學與認同的關係。

一、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公眾框架：資訊公開透明與中國

整體而言，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在 COVID-19 的討論，以中國為圓心，地理位置為軸線，依照地緣政治的層次，發展出臺灣防疫政治、兩岸關係、國際疫情的論述框架。臺灣防疫政治針對臺灣的防疫政策與結果，進行泛政治的討論；在兩岸關係上，著重親中與反中派的對立，雖然親中發文較少，但親中與反中的對立鮮明。在國際疫情上，以中國在國際政治角力的影響力為角度，談國際組織、各國政策、國際疫情，反觀臺灣對立政黨的邊境政策。

目前文獻發現新聞論述中的傳染病框架多為泛論框架（general frames）：健康（health severity）、經濟、政治（political context）、咎責（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保證（reassurance）、衝突框架（conflict）等（Lee & Paik, 2017; Lee & Basnyat, 2013; Mutua & Ong'ong'a, 2020;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泛論框架難以聚焦在討論脈絡，況且，有時文本的框架歸屬難以互斥，有的文本同時談到經濟又談到咎責。當議題只能歸類為經濟或咎責框架，難以看出經濟與咎責是在政治脈絡上討論的。又例如當議題只能歸類為政治框架時，也不易看出政治討論的層次。回歸網路論述，社群使用者在討論疫情的過程中，也扮演守門人的角色，選擇議題、傳遞觀點，在反映民意的同時，也反映特定框架形塑民意（Brown, Yoo, & Johnson, 2019）。本研究關注公眾論述框架，利用共現詞的詞頻與機率（co-occurrence），打散所有文本，歸納出 COVID-19 的討論框架，出現地緣政治的層次，讓我們更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細緻得看到網友在討論 COVID-19 時，反映出中國在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進一步從主題模型來看，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公眾論述圍繞在資訊公開透明與中國。簡言之，初期疫情從中國迅速擴散的威脅、中國資訊不透明、加上臺灣加入 WHO 等阻力，引發兩板網友對中國的新仇舊恨，而呈現親中與反中的熱議。三個層次的論述框架上，都有反中主題。網友最在意「資訊公開透明」，這也是對中國政府最大的疑慮與不滿。

COVID-19 疫情從中國武漢爆發，春節過後武漢封城，中國確診、死亡急遽增加（藍孝威，2020 年 1 月 26 日），疫情迅速擴散至中國與歐美等其他國家，美日南韓等各國開始撤僑，並停飛中國班機（王子欣，2020 年 1 月 30 日；諶悠文、黃菁菁，2020 年 1 月 30 日）。可見當時中國疫情嚴重，外界亟需了解疫中國內部的情況，以及病毒擴散方式，可惜相關資訊不夠充足、可信（陳崢詒，2020 年 12 月 1 日），各界質疑中國官方資訊不夠透明（The Associated Press, 2020, June 2），出現對中國是否隱匿疫情的聲浪。美參議院聯名致函 WHO 邀請臺灣成為世衛觀察員中的信函指出，中國對疫情的訊息不夠透明，有可信疑慮（彭琬馨，2020 年 2 月 2 日）。美國部分州因此對中國提起國際訴訟，指控中國隱瞞疫情相關資訊（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24 日）；中國也遭懷疑疫情爆發時，並未主動通報世衛（CNA, 2020, July 4；馮英志，2020 年 7 月 4 日），這些時事在八卦板與政黑板熱議，「中國隱匿」成為兩板網友討論的鮮明主題。「中國隱匿」主題跨框架延伸到兩岸關係、臺灣防疫政治與國際疫情框架。除了中國內部的疫情隱瞞，當時，臺灣希望加入 WHO，參與 WHA（World Health Assembly），取得更多第一手的疫情資料，始終未果，加劇網友對中國的不滿。再加上 WHO 將臺灣列為中國一部分，引起中國確診病例是否算進臺灣病例數

等計算爭議（簡恒宇，2020 年 2 月 4 日）、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禁航令，同樣擴及臺灣（簡恒宇，2020 年 2 月 6 日）等事件觸動臺灣敏感的國際地位與國家認同，譚德賽、世衛組織都成為熱門的批評對象。連帶中國的資訊控管如何影響世衛組織的資訊透明度，以及北韓利用駭客竊取、監控他國資訊、也是網友關注的主題，可見兩板網友非常重視資訊公開透明。

然而，對比批踢踢網路論述多聚焦於探討中國的防疫表現，在 Ebola 爆發初期，學者發現美國 Twitter 使用者並未對於西非國家的防疫表現多所著墨，反而多為為西非祈禱，或是聚焦於第一例 Ebola 患者的討論，以藉警示他人，並討論感染 Ebola 之原因與預防（Odlum & Yoon, 2015）。兩者對傳染病發源地的差異，顯示民眾的風險感知差異，與其所在地理位置和傳染病發源地高度相關，因此展現在討論疫情層面上，是否採用咎責或祈禱祝福的差異。也就是說，高風險感知與咎責論述為一體兩面。因此由於西非與美國在地理位置上的距離，說明在美國境內感染 Ebola 的低風險，形成民眾所感知的風險較低，因而產生較友善的態度。反之，臺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以及曖昧的政治認同，使得 COVID-19 風險感知著重在政治層面，導致咎責論述為主流。

再者，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眼裡只有中國，不論討論到疫情的任何面向，都會講到中國。兩岸關係框架著重在中國內部與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國際疫情框架圍繞在中國對全球疫情、物資的影響。即使是與中國無關的討論，網友也會把不同意見者貼上「中國」標籤。在與中國無關的臺灣防疫政策，也與中國相較，從疫情、政治制度、資訊透明的比較中得到優越感，與強權相較下，網友彷彿得到阿 Q 式的精神勝利，反而凸顯臺灣的弱勢（國際地位的不明確、依賴美國或屈服中國、臺灣經濟對中國的依賴）。這些討論反映當時臺灣加入國際組織的困難，引發網友對中國的不滿。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相較之下，與疫情民生較相關的主題（紓困、口罩物資、磐石敦睦艦）討論量少於中國相關主題。但追究疫情源頭與中國政權對臺灣的實質防疫小於紓困與物資，顯示網友著重兩岸間的政治衝突。除了國家認同與國際地位的弱勢，或許與當時臺灣疫情不嚴重，病例數遠低於國際，大部分確診病例為境外移入。以 2020 年五月底為例，當時全球感染人數六百萬人，超過 36 萬人死亡，相較之下，臺灣 442 人確診，7 人死亡（報導者，2022 年 8 月 10 日）。即使當時國內受矚目的染疫事件：磐石艦隊官兵染疫足跡擴及臺灣各處，曾引起一陣警戒，但最終並未威脅社區（楊雅棠，2020 年 5 月 27 日），六月初連續八週無新增病例，臺灣大規模解封（報導者，2022 年 8 月 10 日）。相較國際疫情的嚴峻，臺灣內部疫情穩定。因此兩板網友的注意力不在實質防疫，而在中國議題。反觀，中國網友在 COVID-19 初期，關注中國內部（如李文亮事件）⁴，或中美間的矛盾，甚少提及臺灣（Chen, Chen, Zhang, Meng, & Shen, 2020; Zhu, Fu, Grépin, Liang, & Fung, 2020）。顯現，中國占據臺灣民意的部分，但反之卻不亦然。

整體而言，本研究搜集的網路論述多呈現對中國政府的負面觀感，尤其表現在疫情處理與國際外交上，此發現與全臺民意調查，「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結果呼應（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2020 年 9 月 28 日 a, 2020 年 9 月 28 日 b），顯示本研究呼應臺灣民意。該調查指出：六成六臺灣民眾對中國政府印象不佳，民眾認為兩岸在政治、軍事、外交上為對立與緊張狀態。本研究發現的論述框架可進一步解釋臺灣民眾感到對立與緊張的原因。

本研究發現 COVID-19 網路討論泛政治化與先前研究呼應。在公衛

⁴ 中國醫師李文亮為首位示警 COVID-19 的吹哨人，卻被警局警告發布不實訊息而遭法辦，最後因感染 COVID-19 而逝世（BBC 中文網，2020 年 2 月 6 日）。

健康議題的網路論述多為政治討論 (Liu, Ophir, Walter, Himelboim, & Tsi, 2022; Walter et al., 2020;)。Liu et al. (2022) 探討 COVID-19 期間，臺灣加入 WHO 在 Twitter 上的標籤行動 (Hashtag activism)，同樣發現不同層次的政治討論框架：Twitter 使用者從中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以及國際合作防疫的框架討論臺灣是否該加入 WHO。網路論述凸顯「公衛議題、政治解決」的現象。Walter et al. (2020) 發現在美國的疫苗討論中，有俄羅斯網軍的操作痕跡，針對美國兩大黨的選民投注不同的疫苗討論，目的是讓兩大政黨的候選人更加排斥敵對政黨，造成美國選民的分化。然而，臺灣在 COVID-19 爆發初期，國內疫情平緩，隔岸觀火中國與國際疫情，在疫情風險感知上著重政治層面，兩岸關係與臺灣的國際地位。尤其疫情爆發地點為中國，觸碰到臺灣民眾在意的政治認同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22)，批踢踢網友以疫情咎責為題，實則論辯中國善惡，使八卦板與政黑板的疫情討論偏離科學。

二、建立認同與反諷政府隱喻

芒果乾隱喻呈現二元對立的矛盾，建立「反政府」認同，也達到反諷的效果。種植芒果、生產芒果乾者為臺灣農民，對比販賣亡國感的政府。以農民純樸老實的意象對比掌握權勢的政府，劃分我族與他者。農民的芒果乾被政府用來宣傳恐慌。以農民純樸老實的意象對比掌權的政府，呈現我族的良善對比他者的邪惡。以臺灣外銷的芒果乾對比政府在國內製造亡國感的恐慌；芒果乾的甜蜜對比亡國感的恐懼。凸顯芒果可愛香甜與亡國感恐懼的強烈對比，達到反諷效果。

不同於多數論述使用「戰爭」隱喻政治、外交、天災等危機，藉以引起大眾的警覺。本研究發現，臺灣使用「芒果乾」隱喻政府藉由疫情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製造亡國危機。芒果是臺灣民眾熟悉、喜歡的自產水果，以芒果的可愛隱喻反諷政府製造亡國的危機感，凸顯芒果與亡國的反差感。直接批評政府容易令人產生防衛心態，但是帶有幽默感的間接反諷，藉由受歡迎的水果，產生聯想或比喻，讓人第一時間覺得喜歡芒果，不排斥芒果乾的隱喻反諷。芒果乾是從臺灣共同經驗與情境作的隱喻，讓人很快理解民眾對政府製造恐慌的複雜運作，熟悉的來源領域作隱喻有鮮明的預示效果（priming effect）（Kövecses, 2018），當「芒果乾」的隱喻普遍出現時，人們不知不覺將芒果乾聯想到「政府販賣亡國感」。

三、八卦板與政黑板的 COVID-19 公眾論述模式與認同

COVID-19 為重要公衛議題，網友卻多政治解讀，顯現民眾期待政府、政治能解決重要的公衛議題。網友情緒化地將文字轉化成召喚認同的工具，在討論公眾議題的過程中不自覺選邊站。緊急的公眾議題通常透過文字轉化與渲染情緒，要素有修辭、公眾、危機（Edbauer, 2005），以下分別分析之。

根據概念隱喻理論（Demmen et al., 2015; Williams Camus, 2009），文字的使用經過內容創作者的轉化（強調／忽略某些面向與情境化）賦予不同的意義。本研究發現，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在討論 COVID-19 關注中國，分成親中與反中兩派。各自的用語，在不同的立場下衍生成不同意涵。

兩岸關係框架出現中國與大陸的差異。反中網友使用「中國」，八卦板與政黑板親中網友使用「大陸」。在反中立場的用字上，中國成為負面詞，說者將「中國」、「資訊不透明」、「疫情源頭」、「擴散疫情」的言論網綁，強調中國的錯誤與逃避責任。在爭論的情緒化情境

中，中國含有貶抑意味，「為什麼不滾回中國、你是中國來的嗎」，分化出臺灣一邊、中國一邊，對比雙方資訊透明與政治體制上的差別，使用正面語詞描述臺灣、負面形容中國，強化中國一詞的負面觀感。

反中網友貶抑中國製造認同感，強化中國資訊不透明、中國為疫情源頭，並以疫情擴散全球的後果咎責中國，忽略各國疫情嚴重與人民不戴口罩或該國政策失當有關，中國非疫情嚴重的唯一因素。針對中國的疫情穩定，批踢踢反中網友反而推論為疫情資訊不透明，並強加陰謀論：中國意圖輸出病毒，以凸顯極權優於民主體制。或是中國的疫情穩定轉化成犧牲民眾自由，強調專制體制的缺點。當時的新聞「中國疫情延燒 習近平神隱」（周虹汶，2020 年 2 月 5 日），指責中國政府對內隱瞞疫情（自由時報，2020 年 6 月 11 日）；加上習近平曾經在疫情延燒之時，一週未公開露面，引發媒體揣測（BBC 中文網，2020 年 12 月 29 日；周虹汶，2020 年 2 月 5 日；大紀元時報，2020 年 2 月 5 日），新聞報導是兩板網友討論的依據，如「臺灣政府官員的記者會即時公開新增病例原因，反觀中國，出事就隱瞞，習包仔神隱，官員神隱，病例更新作假」。這類討論忽略面對緊急公衛危機時，有時政府的強制手段是必要之惡。網友再利用對比突顯我優他劣之處，連結臺灣的防疫成果（疫情緩和）為資訊透明。因此，臺灣與中國在反中網友的描繪中，成為對立的兩邊。即使其他網友不認同反中言論，但是「臺灣」一詞巧妙地包含立場不同的所有臺灣人，讓不同意該意見的臺灣民眾無形中選擇臺灣邊，這就是利用文字置換意義、注入認同的方式。

相反的，親中派使用「大陸」稱呼。大陸多半與朋友、友人、和善等詞語一起出現。雖然呈現大陸的友善用語，但親中言論不用中國稱呼，而以大陸稱呼，喪失搶奪賦予「中國」一詞正面意義的機會。「大陸」一詞的出現數量遠低於「中國」，較友善的大陸一詞用法能見度較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低。從概念型隱喻中，可看出網友利用隱喻建立認同。區分我族與他者後，藉由建立「同一國」的歸屬感，強調我族與他者屬於不同群體，凸顯我優他劣，提升我族優越，將他者歸類為對立面或邪惡方。但同一國是想像的，隱喻是創造想像共同體的工具。

另外，在建立敵我的語言轉化中，「情緒用詞」是很鮮明的現象。網友多使用口語、粗話、謾罵、嘲諷重新詮釋或強調 COVID-19 與中國的關係。口語化、情緒化的修辭與區分敵我帶來更多公眾，情緒用詞容易激起網友同仇敵愾，吸引更多同立場的網友留言與回文（Berger & Milkman, 2012; Stieglitz & Dang-Xuan, 2013），達到關鍵多數後，可能成為聲音大聲的少數人，卻讓多數人有樂隊花車效果，不自覺選邊站。

公眾論述建立的「危機感」鮮明：臺海開戰、臺灣無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上述危機凸顯臺灣的弱勢：臺海開戰的國力弱小、國際上被排擠，該論述踩中臺灣人最自卑的點，反中網友再把原因歸咎對方（隱瞞疫情、傳染疫情、動機惡意）。創造危機以樹立對方敵意，建立我群的認同感。

綜上所述，雖然 COVID-19 初期臺灣疫情平穩，網友未感受到立即的健康風險，但是傾向於將疫情連結至臺海衝突，進而形塑認同危機風險，淡化疫情的其他面向。整體而言，網路論述較少著墨於新興傳染疾病的認識或衛教訊息之討論，反倒呈現疫情是指責中國的借題發揮，實則製造臺灣危機，樹立中國對臺敵意，建立臺灣的認同感。

在公眾論述模式的要素：修辭、公眾、危機之外（Edbauer, 2005），本研究提出，論述要創造認同須建立共同的敵人，在論述模式中加入敵我、情緒與樹立對方敵意的要素。COVID-19 公眾論述製造認同的方式為：利用語言分群（區分敵我）、情緒化語言、透過比較，凸顯我群優越（專制體制對比民主制度），建立共同敵人。建立危機後，

強化對方敵意，連結危機因共同敵人而起，進而製造群體認同。例如，八卦板與政黑板網友以情緒化語言歸咎中國政府在 COVID-19 的責任、扣連資訊不透明、專制制度等呈現中國的負面形象，再以臺海危機凸顯中國對臺的敵意，樹立中國、臺灣的對立。臺灣一詞廣泛包含整體，營造出部分網友代表全體的意味。

此現象同樣出現在同婚運動的網路論述。推動社會運動的先決條件是蓄積支持者的網路聲量，標示共同的敵人可有效的建立我群與他者，標明敵我的差異、情感訴求，形塑敵方對我方的脅迫，迅速累積認同感（陳怡璇、劉桂君，2022）。整體而言，中國因素、兩岸關係是臺灣民眾在疫情爆發初期最關心的議題，也是情緒發洩的借題發揮，因而落入親中、反中的立場之爭。

本研究以創新方法（LDA 結合 ANTEM）發現網路論述主題間的關聯，並以此提出 COVID-19 的公眾論述模式，但仍有些許研究限制：樣本為臺灣疫情發展初期，即 2019 年 12 月 29 日開始至 2020 年 8 月 8 日。分析僅限於臺灣疫情和緩之際，未能涵蓋臺灣疫情不同階段的長期觀察。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 2020 年後期到 2021 年以隔離及疫苗為主的防疫策略，到 2022 年後的疫情末期，觀察網路論述焦點的長期變化。另外，本研究選擇批踢踢，不僅由於八卦板為臺灣首篇揭露 COVID-19 消息的平臺，有其特殊性與意義，同時與政黑板皆為討論 COVID-19 的熱門社群（常出現在熱門即時看板列表）。不過，即使已分析大數據資料，本研究結論僅反映八卦板與政黑板中有參與貼文與回文的網友意見，不包含未發表意見的網友。限於資料處理的人力與物力，本研究並無納入其他板，亦無包含其他社群媒體平臺。但是，這兩板常見政治討論，因此本文發現著重在政治層面。雖可反映批踢踢熱門看板著重政治層面討論，仍建議後續研究納入其他社群平臺或板別，以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對網友之疫情風險的討論與認知有更完整的發現，並比較不同平臺的疫情討論差異。

參考書目

- 大紀元訊（2020 年 2 月 5 日）。〈五常委消失十天習近平隱身 中南海有事？〉，《大紀元時報》。取自 <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20-02-05/46238132>
- 王子欣（2020 年 1 月 30 日）。〈武漢肺炎迅速擴散 全球病例數超越 SARS〉，《公視新聞網》。取自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64513>
- 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24 日）。〈跟進密蘇里州！美密西西比州也將提告中國隱匿疫情〉，《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43928>
- 自由時報（2020 年 4 月 30 日）。〈登上國際！義媒報導：失眠的醫生和 PTT 救了臺灣〉，《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151160>
- 自由時報（2020 年 6 月 11 日）。〈中國人求償第一槍！武漢肺炎受害者家屬怒告政府「隱瞞疫情」〉，《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194169>
- 周虹汶（2020 年 2 月 5 日）。〈中國疫情延燒 習近平神隱〉，《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349794>
- 林佳賢（2019 年 4 月 23 日）。〈【獨家分析】跟著資料記者追網軍，「假外國人」如何在 PTT 鼓吹韓流〉，《天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4848>
- 林思平（2017）。〈網路八卦與真理政治：批踢踢八卦板之閱聽人研究〉，《新聞學研究》，133: 135-188。
- 唐子俊、黃詩殷、蘇薇如、鍾維庭（2022）。〈新冠疫情的人際心理治療：處理憂鬱和創傷〉，《中華團體心理治療》，28(1): 17-24。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23）。〈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臺灣民眾臺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取自 <https://esc.nccu.edu.tw/PageDoc/Detail?fid=7804&id=6960>
- 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治理研究中心（2017）。《Web 2.0 時代的民意探勘：政府部門網路輿情分析的概念與實務》。臺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
- 袁茵（2020 年 2 月 4 日）。〈快問快答／柯文哲爆武漢臺商隔離地 63.6% 網友：支持公開其他 4 處〉。《ET 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

- 20200204/1637873.htm#ixzz845zFMANp
- 張玉佩（2000）。〈認同遇到隱喻：談隱喻在認同塑造的運作〉，《新聞學研究》，64: 73-101。
- 曹開明、劉大華（2019）。〈網路論述的語藝生態學初探：以網路社群討論軍中同志議題為例〉，《傳播研究與實踐》，9(1): 65-103。https://doi.org/10.6123/JCRP.2019.01_9(1).0003
- 陳佳鑫、謝其文、王興中（2020 年 2 月 4 日）。〈史瓦帝尼 WHO 為臺發聲 遭主席打斷〉，《公視新聞網》。取自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65122>
- 陳怡璇、劉桂君（2022）。〈臺灣同婚公投的 Facebook 集體行動框架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2(1): 77-112。
- 梁珮綺、張茗暄（2022 年 2 月 2 日）〈武漢臺商返臺 柯文哲自爆北市隔離地點〉。《中央通訊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2020147.aspx>
- 陳崢詒（2020 年 12 月 1 日）。〈關鍵文件曝光 CNN：疫情初期，中國隱匿〉，《天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5103000?from=search>
- 報導者（2022 年 8 月 10 日）。〈【不斷更新】COVID-19 大事記：從全球到臺灣，疫情如何發展？〉，《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ncov-epidemic>
- 彭琬馨（2020 年 2 月 2 日）。〈7 美參議員籲 WHO 邀臺成為觀察員〉，《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49096>
- 馮英志（2020 年 7 月 4 日）。〈陸主動通報疫情首例給 WHO？世衛官方悄悄改口了〉，《中時新聞網》。取自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704001804-260408?chdtv>
- 黃雅琪（2020 年 4 月 16 日）。〈驚查武漢肺炎疫情初始 莊人祥揭：醫師睡不著逛 PTT 建功〉，《鏡週刊》。取自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0415/edi035/>
- 楊雅棠（2020 年 5 月 27 日）。〈磐石艦 首例三月十日即發病共四波疫情 台灣感染 艦隊抵帛琉前發病〉，《聯合報》，A3 版。
- 網路溫度計（2021 年 10 月 29 日）。〈地震來了先發文再說！地牛翻身你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網路溫度計》。取自：<https://dailyview.tw/Daily/2021/10/29>
- 趙恩、陳國緯、李思賢（2021）。〈臺灣公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之焦慮症狀與防疫作為之趨勢〉，《臺灣公共衛生雜誌》，40(1): 83-96。https://doi.org/10.6288/TJPH.202102_40(1).109115
- 譚悠文、黃菁菁（2020 年 1 月 30 日）。〈美日撤僑 南韓等國紛跟進〉，《中國時報》，A2 版。
-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2020 年 9 月 28 日 a）。〈2020 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民間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 印象 對大陸民眾、政府印象 好壞兩極〉，《聯合報》，A4 版。
-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2020 年 9 月 28 日 b）。〈2020 兩岸關係年度大調查民間印象 兩岸急務 不讓天平向戰端傾斜〉。《聯合報》，A3 版。
- 簡恒宇（2020 年 2 月 4 日）。〈臺灣確診病例 10 個 WHO 疫情報告竟列 13 個〉，《風傳媒》。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53111>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349794>
- 簡恒宇（2020 年 2 月 6 日）。〈「WHO 有病嗎？」從「中國臺灣」變到「臺北及周圍地區」外長吳釗燮怒嗆：臺灣就是臺灣，不是中國任何一部分！〉，《風傳媒》。上網日期：2022 年 11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61988?utm_source=Yahoo&utm_medium=%E7%9B%B8%E9%97%9C%E5%A0%B1%E5%B0%8E%E9%BB%9E%E6%93%8A&utm_campaign=Y!News_RelatedCoverage
- 藍孝威（2020 年 1 月 26 日）。〈英美學者預測 10 天後 武漢恐 27 萬人感染〉，《中國時報》，A3 版。
- BBC 中文網（2020 年 2 月 3 日）。〈武漢疫情：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角力再起〉，《BBC 中文網》。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362362>
- BBC 中文網（2020 年 2 月 6 日）。〈武漢肺炎：最早公開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BBC 中文網》。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403740>
- BBC 中文網（2020 年 12 月 29 日）。〈新冠疫情：回顧今年中國如何噤聲言論與改寫新冠歷史〉，《BBC 中文網》。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5433647>
- PTT 鄉民百科（無日期）。〈看板人數、看板人氣〉。取自 <https://pttpedia.fandom.com/zh/wiki/%E7%9C%8B%E6%9D%BF%E4%BA%BA%E6%95%B8%E3%80%81%E7%9C%8B%E6%9D%BF%E4%BA%BA%E6%B0%A3>
- PTT 實業坊（2022 年 9 月 17 日）。〈歷史的一刻〉。上網日期：2022 年 11 月 22 日，取自精華公佈欄、統計資料：<https://term.ptt.cc/>
- Arun, R., Suresh, V., Madhavan Veni, C. E., & Narasimha Murthy, M. N. (2010). On finding the natural number of topics with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Some observations. In M. J. Zaki, B. R. J. X. Yu, & V. Pudi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Pacific-Asia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Part I* (pp. 391-402). Berlin, DE: Springer.
- Asuncion, A., Welling, M., Smyth, P., & Teh, Y. W. (2012). On smoothing and inference for topic models. In J. Bilmes, & A. Ng (Eds.), *UAI '09: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ifth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p. 27-34). Arlington, VA: AUAI Press.
- Berger, J., & Milkman, K. L. (2012). What makes online content viral? *Journal of*

- Marketing Research*, 49(2), 192-205. <https://doi.org/10.1509/jmr.10.0353>
- Blei, D. M., Ng, A., & Jordan, M. (2003).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3, 993-1022.
- Blei, D. (2012). Probabilistic topic model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55(4), 77-84. <https://doi.org/10.1109/MSP.2010.938079>
- Brown, D. K., Yoo, J., & Johnson, T. J. (2019). Spreading Ebola panic: Newspaper and social media coverage of the 2014 Ebola health crisis. *Health Communication*, 34(8), 811-817. <https://doi.org/10.1080/10410236.2018.1437524>
- Cao, J., Xia, T., Li, J., Zhang, Y., & Tang, S. (2009). A density-based method for adaptive LDA model selection. *Neurocomputing*, 72(7-9), 1775-1781.
- Chen, K., Chen, A., Zhang, J., Meng, J., & Shen, C. (2020). Conspiracy and debunking narratives about COVID-19 origination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How it started and who is to blam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isinformation Review*, 1(8).
- CNA (2020, July 4th). WHO says it was first alerted to coronavirus by its office, not China. CN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asia/covid-19-coronavirus-who-china-944396>
- Dalrymple, K. E., Young, R., & Tully, M. (2016). "Facts, Not Fear": Negotiating uncertainty on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2014 Ebola crisis. *Science Communication*, 38(4), 442-467. <https://doi.org/10.1177/1075547016655546>
- Dan, V., & Raupp, J.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rames in news reporting of health risks: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 consistency vs. name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frames to framing functions. *Health, Risk & Society*, 20(5-6), 203-226. <https://doi.org/10.1080/13698575.2018.1522422>
- De Meo, P., Ferrara, E., Fiumara, G., & Provetti, A. (2011). Generalized Louvain method for community detection in large networks. In S. Ventura, A. Abraham, K. J. Cios, C. Romero, J. M. Benítez, & E. L. G. Galindo (Eds.), *2011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System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 (pp. 88-93). <https://doi.org/10.1109/ISDA.2011.6121636>.
- Demmen, J., Semino, E., Demjén, Z., Koller, V., Hardie, A., Rayson, P., & Payne, S. (2015). A computer-assisted study of the use of violence metaphors for cancer and end of life by patients, family car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2), 205-231. <https://doi.org/10.1075/ijcl.20.2.03dem>
- Edbauer, J. (2005). Unframing models of public distribution: From rhetorical situation to rhetorical ecologies.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35(4), 5-24. doi: 10.1080/02773940509391320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Gamson, W. A. & Modigliani, A. (1987),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 D. Braungart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3 (pp. 137-177). Greenwich, CT: JAI Press.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 Gibbs Jr, R. W., & Franks, H. (2002). Embodied metaphor in women's narrativ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with cancer. *Health Communication, 14*(2), 139-16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027HC1402_1
- Ginsberg, J., Mohebbi, M. H., Patel, R. S., Brammer, L., Smolinski, M. S., & Brilliant, L. (2009). Detecting influenza epidemics using search engine query data. *Nature, 457*, 1012-1014.
- Guo, L., Vargo, C. J., Pan, Z., Ding, W., & Ishwar, P. (2016). Big social data analytic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mparing dictionary-based text analysis and unsupervised topic modeling.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2), 332-359.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16639231>
- Hauser, D. J., & Fleming, M. E. (2021). Mother nature's fury: Antagonist metaphors for natural disasters increase forecasts of their severity and encourage evacua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43*(5), 570-596. <https://doi.org/10.1177/10755470211031246>
- Kott, A., & Limaye, R. J. (2016). Delivering risk information in a dynam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Framing and authoritative voice i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and primetime broadcast news media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2014 Ebola outbrea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69*, 42-49.
- Kövecses, Z. (2018). Metaphor in media language and cogn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Lege artis. Language yesterday, today, tomorrow, 3*(1), 121-141. doi: 10.2478/lart-2018-0004
- Lakoff, G. (1996). Sorry, I'm not myself today: The metaphor system for conceptualizing the self. In G. Fauconnier, & E. Sweetser (Eds.),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s* (pp. 91-12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Conceptual metaphor in everyday languag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77*(8), 453-486.
- Larson, B. M. H., Nerlich, B., & Wallis, P. (2005). Metaphors and biorisks: The war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vasive species. *Science Communication, 26*(3), 243-268. <https://doi.org/10.1177/1075547004273019>
- Lachlan, K. A., Spence, P. R., & Lin, X. (2014). Expressions of risk awareness and concern through Twitter: On the utility of using the medium as an indication of audience need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 554-559. doi: 10.1016/j.chb.2014.02.029
- Lee, S. T., & Basnyat, I. (2013). From press release to news: Mapping the framing of the 2009 H1N1 A influenza pandemic. *Health Communication, 28*(2), 119-132. <https://doi.org/10.1080/10410236.2012.658550>
- Lee, S., & Paik, J. E. (2017). How partisan newspapers represented a pandemic: the case of the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South Kore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7*(1), 82-96.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6.1235592>
- Lewis, S. C., Zamith, R., & Hermida, A. (2013). Content analysis in an era of big data: A hybri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and manual method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1), 34-52. <https://doi.org/10.1080/08838151.2012.761702>

- Liu, A. K., Ophir, Y., Tsai, S. A., Walter, D., & Himelboim, I. (2022). Hashtag activism in a politicized pandemic: Framing the campaign to include Taiwa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efforts to combat COVID-19. *New Media & Society*, 0(0).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21099173>
- Luther, C. A., & Zhou, X. (2005).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politics: News framing of SA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2(4), 857-872.
- Maier, D., Waldherr, A., Miltner, P., Wiedemann, G., Niekler, A., Keinert, A.,... Adam, S. (2018). Applying LDA topic modeling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oward a valid and reliable methodology.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12(2-3), 93-118. <https://doi.org/10.1080/19312458.2018.1430754>
- Musolff, A. (2004). *Metapho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debates about Europe*. London, UK: Palgrave-Macmillan.
- Mutua, S. N., & Ong'ong'a, D. O. (2020). Online news media framing of COVID-19 pandemic: Probing the initial phases of the disease outbreak in international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ultimedia and Education*, 1(2). <https://doi.org/10.30935/ejimed/8402>
- Odlum, M., & Yoon, S. (2015). What can we learn about the Ebola outbreak from tweets?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43(6), 563-571.
- Odlum, M., & Yoon, S. (2018). Health information needs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during the 2014-2016 Ebola outbreak: A Twitter content analysis. *PLoS Currents*, 10.
- Oh, H. J., Hove, T., Paek, H.-J., Lee, B., Lee, H., & Song, S. K. (2012). Attention cycles and the H1N1 pandemic: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US and Korean newspaper coverage.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2(2), 214-232. <https://doi.org/10.1080/01292986.2011.642395>
- Ophir, Y., Walter, D., Arnon, D., Lokmanoglu, A., Tizzoni, M., Carota, J.,... Nicastro, E. (2021). The framing of COVID-19 in Italian medi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mobility: A mixed-method approach.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6(3), 161-173.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0.2021.1899344>
- Petersen, K., & Gerken, J. M. (2021). # Covid-19: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hashtag usage on Twitter. *Health Policy*, 125(4), 541-547.
- Polgreen, P. M., Chen, Y., Pennock, D. M., & Nelson, F. D. (2008). Using internet searches for influenza surveillance.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47(11), 1443-1448.
- Ramos, J. (2003). Using tf-idf to determine word relevance in document quer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struc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242(1), 29-48.
- Read, S. J., Cesa, I. L., Jones, D. K., & Collins, N. L. (1990). When is the federal budget like a baby? Metaphor in political rhetoric.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5(3), 125-14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868ms0503_1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 Ribeiro, B., Hartley, S., Nerlich, B., & Jaspal, R. (2018). Media coverage of the Zika crisis in Brazil: the construction of a 'war' frame that masked social and gender inequaliti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 137-144.
- Saud, M., Mashud, M. I., & Ida, R. (2020). Usage of social media during the pandemic: Seeking support and awareness about COVID-19 through social media platforms.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20(4). <https://doi.org/10.1002/pa.2417>
- Scheufele, D. A.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1), 103-122.
- Scheufele, D. A. (2000). Agenda-setting, priming, and framing revisited: Another look at cogni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3(2-3), 297-316.
- Semetko, H. A., & Valkenburg, P. M. (2000).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2), 93-109. <https://doi.org/10.1111/j.1460-2466.2000.tb02843.x>
- Shahin, S., & Zheng, P. (2020). Big data and the illusion of choice: Comparing the evolution of India's Aadhaar and China's social credit system as technosocial discourse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8(1), 25-41.
- Signorini, A., Segre, A. M., & Polgreen, P. M. (2011). The use of Twitter to track levels of disease activity and public concern in the US during the influenza A H1N1 pandemic. *PLoS ONE*, 6(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19467>
- Smyth, P., Welling, M., & Asuncion, A. (2008). Asynchronous distributed learning of topic models. In D. Koller, D. Schuurmans, Y. Bengio, & L. Bottou (Eds.), *NIPS'08: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pp. 81-88). Red Hook, NY: Curran Associates Inc.
- Stieglitz, S., & Dang-Xuan, L. (2013). Emotions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social media—Sentiment of microblogs and sharing behavi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9(4), 217-248. <https://doi.org/10.2753/MIS0742-1222290408>
- The Associated Press (2020, June 2). China delayed releasing coronavirus info, frustrating WHO. *The Associated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apnews.com/article/united-nations-health-ap-top-news-virus-outbreak-public-health-3c061794970661042b18d5aeaaed9fae?fbclid=IwAR3ShVC02fuo47GWlftXIwazhJktg6GtaePF9qw-RrnaXFQjQf8QPUKYgwo>
- Twitter Public Policy. (2020, June 15). Talking #MentalHealthAwareness on Twitter with our global partners. Retrieved from Twitter Blog Web site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company/2020/talking-mental-health-awareness-on-twitter
- Vogels, E. A., Perrin, A., Rainie, L., & Anderson, M. (2020). *53% of Americans Say the Internet Has Been Essential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Retrieved from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0/04/30/53-of-americans-say-the-internet-has-been-essential-during-the-covid-19-outbreak/>
- Walter, D., & Ophir, Y. (2019). News frame analysis: An inductive mixed-method

- computational approach.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Measures*, 13(4), 248-266. <https://doi.org/10.1080/19312458.2019.1639145>
- Walter, D., Ophir, Y., & Jamieson, K. H. (2020). Russian twitter accounts and the partisan polarization of vaccine discourse, 2015-2017.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0(5), 715-724. <https://doi.org/10.2105/AJPH.2019.305564>
- Williams Camus, J. T. (2009). Metaphors of cancer in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rticles in the British press. *Discourse Studies*, 11(4), 465-495. <https://doi.org/10.1177/1461445609105220>
- Wong, A., Ho, S., Olusanya, O., Antonini, M. V., & Lyness, D. (2021).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s in times of pandemic COVID-19. *Journal of the Intensive Care Society*, 22(3), 255-260.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WHO Coronavirus (COVID-19) Dashboard*. Retrieved July 19, 2022, fro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 site: <https://covid19.who.int/>
- Yoo, W., Choi, D. H., & Park, K. (2016). The effects of SNS communication: How expressing and receiving information predict MERS-preventive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South Kore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2, 34-43.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03.058>
- Young, R., Tully, M., & Dalrymple, K. E. (2018). #Engagement: use of Twitter chats to construct nominal participatory spaces during health cris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4), 499-515.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17.1301518>
- Zhu, Y., Fu, K.-W., Grépin, K. A., Liang, H., & Fung, I. C.-H. (2020). Limited early warnings and public attention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in China, January-February, 2020: A longitudinal cohort of randomly sampled Weibo users. *Disaster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14(5), e24-e27. <https://doi.org/10.1017/dmp.2020.68>

In the Name of the Pandemic: Exploring COVID-19 online discourse

Victoria Y. Chen, Anita K.C. Liu*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2020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news. On March 12, 202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nnounced COVID-19 as a pandemic, with more than two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worldwide. Taiwan is one of the closest countries to China, which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disease. As of May 7, 2020, 440 people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COVID-19, and six people have died. The relatively lower confirmed cases and deaths can offer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aiwan's containment of the virus.

Given the challenge of the global pandemic,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presenting the cris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context of a health crisis, previous studies contend that news coverag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fluencing risk perception.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raming, communicators

* Victoria Y. Chen (Ph.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Her research intersects with social media, online discourse, and framing. She is concerned with how online messages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E-mail: vickiechen@alum.ccu.edu.tw.

Anita K.C. Liu (Ph.D., The University at Buffa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tudies political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and framing effects in political, health, and science information contexts. Her work draws methods from social and computer science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campaign framing on public opinion (e.g., computational text analysis, network analysis and experiment). E-mail: kueichun@buffalo.edu.

can define the problems (Nisbet, 2009) in the way of positioning and highlighting specific attributes over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communicators potentially guide the audience to think and make judg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news frames (Entman, 1993).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news media coverage impacts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perceptions of the risks of COVID-19, especially among people who watch and are exposed to it on a daily basis.

Social media users are important gatekeepers who amplify specific narratives by sharing news articles and engaging in online discussions (Brown, Yoo, & Johnson, 2019). While journalist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nd writing messages for distribution, nowadays, social media users contribute to selecting and redistributing specific content and creating new content (Odlum & Yoon, 2015). Studies also show tha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principal sphere for exchanging information during the disease's outbreak (Wong et al., 2021).

Purpos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 (PTT) users in Taiwan conceive COVID-19, and how they perceive risk. In other words, we examine the online discourse related to COVID-19 and how people talk about it online. We further explore the ideology embedded in the discussions. Specifically, we adopt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o illustrate the hidden meaning in online discourses related to COVID-19. Building upon the concept of rhetorical ecologies, we also explore why and how specific topics draw public attention and become public agendas.

We extend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framing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multiple ways. First, this study employs computational unsupervised text analysis, termed Analysis of Topic Model Networks (ANTMN) (Walter & Ophir, 2019), to study the online discourse surrounding COVID-19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opics. Prior works mainly focus on media frames regarding the epidemic, and most rely on deductive, theory-driven

以瘟疫之名：探討公眾風險感知的 COVID-19 網路論述與詮釋，以批踢踢八卦板與政黑板為例

categories, where frames are pre-defined before analysis and then applied to texts. While informative, such a deductive approach is prone to researchers' biases and may miss emerging frames that not found in the past (Walter & Ophir, 2019; van Gorp, 2010). Furthermore, these frames are mostly general and fail to present the nuances of discussions during the global health crisis. By employing the new approach of framing study, ANTMN, we discover frames inductively and reduce such biases (Walter & Ophir, 2019). Building upon the frames of the discussions, we further adopt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rhetorical ecologies to examine the ideology behind the frames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the rhetorical technique contributes to the topic salience. Specifically, we ask the following.

RQ1: What are the frames of online discourse related to COVID-19?

RQ2: What topics are PTT Bulletin Board System (PTT) users most interested in?

RQ3: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opics of online discourse?

Method: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bout the theme of discuss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examine posts along with comments using the keywords “COVID-19” (or “新冠肺炎” in Chinese) and “Wu Han virus” (“武漢肺炎”) on PTT, which is a Reddit-like forum in Taiwan. The sampling time spans from December 2019 to August 2020. The total sample size is more than 208 million posts and comments. We employ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Topic Model Networks (ANTMN) approach (Walter & Ophir, 2019) over half a year during the 2020 pandemic. ANTMN is a 3-step approach, consisting of modeling a topic model, calculating a network of topics based on their cooccurrence in documents, and clustering topics into themes using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s.

Findings: Our analysis of more than 2 million texts find 50 topics of

discussion clustered into three thematic clusters: Taiwanese pandemic-prevention politics, Taiwan-China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andemic. The Taiwanese pandemic-prevention politics frame includes conversations surrounding prevention behavior related to wearing masks and staying at home for the public good. However, the most prominent topic covers political discussions about government measures, such as the debate between political figur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Based on the threat of China to Taiwan, The Taiwan-China relations frame describes the origin of COVID-19 and China'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ndemic.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andemic frame, online discourse revolves around the global pandemi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political power over other countries. These three frames focus on China'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ndemic in a geopolitical sense: Taiwan domestic politics, Taiwan-China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verall, essential discussion about COVID-19 is scarce. The pandemic is merely an excuse for Taiwan to blame China for reconfiguring the Taiwanese identity.

Implication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discussio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ealth, science, and geopolitics. The discourse around the pandemic involves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affiliation, showing a discussion that attempts to embed identity or political ideology and combine emotional needs (e.g., patriotism) with political messaging (discussing the political force of China over the WHO) and practical information (promoting Taiwan's abil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effort by emphasizing its own innovation and public health infrastructure). This study helps further develop the metaphor theory and demonstrates its ability to establish new mechanisms of dialogue and influences during a time of global crisis.

Keywords: COVID-19, online discourse frames, topic modeling, topic network analysis